

高樂康著

文化方面的傳教工作

田耕筆題

P. LEGRAND 著
景明譯

文化方面的傳教工作

北平鐸聲月刊社發行

田樞機主教序

高樂康司鐸前在鐸聲月刊發表的傑作「文化方面的傳教工作」，最近由鐸聲月刊社印爲單行本，高司鐸並希望我作一篇序，我很樂意的接受了。

去年我到北平履新以後，不久我就病了，病中方杰人司鐸曾把遺稿數萬字的鉅著送給我，而且在未看之前便對我說明，這是很有意義的一篇文章，在教會裏尚不多觀。當時我即在病榻上化了幾天時間，細讀一過，讀後我覺得有許多話正是我想說的，也正是很多關心教務的人所想的，現在既由高司鐸提出來，我想必能引起教會人的注意。

現在只就我個人的感想說一說：

我最認爲喜慰的，便是獻縣趙主教的賀函，內引民國七年十月十八日已故獻縣劉主教答傳信部調查表的話，劉主教早在那時就向羅馬坦白說明向智識階級傳教的重要，並提出新教的各種努力，同時亦認爲必須注意各種形式的新聞事業。劉主教在三十年前已經有了這麼遠大的目光，真使人欽佩！這和前輩馬相伯先生對傳信部所答的話完全相同，（見方豪編馬相伯先生文集二一七頁）更使人感慨萬端。我們惟一的感慨是我們並不是沒有先知先覺，但先知先覺的意見，何以久久沒有生效？因此當我在醫院內讀完高司鐸的論文時，某君問我有何感想，我說：

「好極了，只怕沒有人去做！」三十年前劉主教和馬先生說過的話，需要三十年後再有人來發揮，是不是今天高司鐸所說的話還需要三十年後再有人來舊事重提呢？

高司鐸這篇論著的範圍非常廣泛，其中最使我關心的便是「本籍司鐸之培養」的那一章，他特別注意到公教著作家的培養，他也贊成「區際聯立小修院」的制度，對於這一點，可以說高司鐸和我所見相同，我一到北平便着手創辦聯立小修院，也就是蒙家厚意，為紀念我而命名的耕莘中學。關於「外籍司鐸之培養」，高司鐸看到語文研究的必要，以及「漢學書院」或「中國學術研究院」的提議，實在是卓見，不能不令人佩服。

此外許多寶貴的意見——雖然只是意見，我們希望讀者加以注意，共同研討，攜手合作，大家起來擴展中國的歸主運動。目前正是時機，不要說現在國家尚未恢復平靖，正因為國家多難，變亂頻仍，所以人人都渴望獲得宗教上的安慰，陳援菴先生在他的「漢黔佛教考」一卷六，亂世與宗教信仰第十七）中說得好：「人當得意之時，不覺宗教之可貴也，惟當艱難困苦顛沛流離之際，則每思超現境而適樂土，樂土不易得，宗教家乃予以心靈上之安慰，此即樂土也，故凡百事業，喪亂則蕭條，而宗教則震亂版依者愈衆，宗教者人生憂患之伴侶也，六朝五代，號稱極亂，然譯經莫盛於六朝，五宗即昌於五季，足見世亂與宗教不啻相妨，有時且可擴張其勢力。」何況現政府在賢明的蔣主席領導之下，很誠懇的希望和教會合作，「信仰自由」重新規定在憲法上，各處的地方政府，地方長官，亦無不竭誠和我們攜手，光就這一點說

來，已是千載一時的良機，再加上教體的建立，教廷使節的來華，教會外表氣象一新，我們對促進教務的工作，似乎也應該刷新一番，亦不必說交通困難，經濟拮据，沒有宗教信仰的人，他們爲達到政治上或任何事業上的成就，尙能勇往直前，不致知難而退，我們有神力可恃，更該該有自信力，自信世界上沒有一種阻力是不能克服的。有此毅力，若再能把各種傳教良法，運用得宜，我敢說天主教在中國的繁盛是指日可待的。不知 高司鐸和 讀者以爲何如？

一九四七年中國主保聖若瑟瞻禮日 田耕莘序

著者序言

本文法文原作上部在教務叢刊發表後，筆者接到獻縣區代牧趙主教來函，獎勉有加，不勝欣感之至。現將該函內容摘譯於後：

「神父的大作，業已看過，各方面都令人滿意，個人也沒有什麼意見，也沒有什麼批評；謹致賀意，期望您繼續發表意見，並早日見諸實行，因為時機業已到了。」

「本牧前任劉主教 Mr. Lecourt 遠在一九一八年之際，關於向智識界傳教，國內各教區彼此合作二事，已與神父抱有同樣見解。以下是他的原意，毫無增損。『目前國內勢力，既仍舊在「士」的手裏，唯一打進富裕階級的方法，就是創設各級教育機關。誓反教徒在各大都市裏，憑藉着他們的基督教青年會和各種教育機關（計大學七所，醫學校十六處）對中產以上的中國人發生了很大的影響。他們的策略與成效，指出了進攻的正確方式，即是貧民學校，貴族學校，醫學專門學校，職業學校。大戰結束乃是公教徒向外擴充勢力的唯一機會（*Plus est ad hostibus decet*）何妨從對手學習一下。」

但因個個教區大致地都沒有相當的人力財力，只能聯合好幾個教區為一組，用公攤的經常費去創辦公益事業，教育事業之外，第二個方法，就是各種形式的新聞事業，但主持新聞事業的人，必得是聖德與學識俱不尋常的人物，得對於中國文學有素養而又能駕馭僚屬的

人。假使天主教會在教育界言論界不能插足，佔到上風，還是那句話，中國很可能再走到它的固有信仰裏去。萬一選定了國教，恐怕就無可挽回了。」（民國七年十月十八日答傳信部調查表語）

「可敬愛的神父，我把抄給您看的這些話，算作我自己的意見。所以希望您把在最近一期教務叢刊裏（去年十二月號）發表的長文，完全譯成中文，載入鐸聲雜誌，在該刊本年第一期裏看到的那一篇，實在太短了。要說服讀者，得發揮得更詳盡些。所以希望神父把您未發表的那篇長文，也譯成中文，在該刊披露，以便一般中國司鐸們明瞭您的意見，而爲愈顯主榮肯去幫您的忙。」

這封如此關切的信，經筆者轉寄鐸聲編輯部後，承蒙不棄，不但肯將全部譯文在本刊發表，並爲它特出了一個專號。

這裏筆者敬向趙大主教致謝他的好意鼓勵，並衷心感謝本刊編輯李君武司鐸惠假篇幅，最明先生義務幫忙代譯中文。

筆者得能把這篇譯文貢獻給中國同道，尤覺欣慰。因爲我堅決相信，文化傳教工作的主角正是他們，而個人最大的願望，就是能與他們幫忙，致力於他們可愛祖國的歸化運動。

讀者如有任何糾正，批評，或補充意見，務懇不吝賜教，以便筆者更容易完成這篇拙作，而將這些對於中國公教前途大有關係的問題，弄得更清楚些，那就尤其感謝不盡了。

文化方面的傳教工作

序 言

田樞機主教序

著者序

第一章 課題的本身

第二章 新聞事業

第一節 大都市的報紙

第二節 各地方的報紙

第三節 與教外刊物合作

第三章 出版事業

第一節 創作

第二節 譯述

第三節 公教書籍的流通

一

七

一八

第四章	社交關係	三四
第五章	文化合作	四〇
第六章	講演	四八
第七章	全國大會	五二
第八章	教育事業	五六
第一節	學校在文化事業的功用	
第二節	學校與公教文化人訓練	
第三節	留學生	
第四節	畢業學生之指導	
第九章	本籍司鐸之培養	七二
第一節	培養之必要	
第三節	大修歸時代的培養	
第二節	德性之培養與本國學識——證書	
第四節	特殊培養	
第五節	問題之重要性	

第十章 外籍傳教士之修養 八七

第一節 特殊修養之必要 第二節 語文研究

第三節 普通中國學識——證書 第四節 大修院或神學院時代的修養

第五節 教務雜誌

第十一章 文化傳教工作之組織 一〇〇

第一節 大家合作 第二節 文化工作協會

第三節 主教會議

結 論 一一一

附 錄

關於現代中國思想動態的檢討 一一八

檢討的必要性 檢討的性質 計劃

觀點 精神

文化方面的傳教工作

高樂康原著
景明譯

——幾種戰後計劃——

第一章 課題的本身

目前的緊張時局對於中國各地教會一般事業，固不無相當打擊，甚至多數的傳教士迫於環境，一切事工都陷於停頓狀態；可是藉此休止的期間，反可回顧前蹤，做一番自我檢討的功夫；把整個的中國歸化問題，加以統盤籌劃，在平時，大家牽於煩瑣的日常職守，限於本教區的狹小範圍，容或心力交瘁，不易統籌全局。把眼光放得遠大。現在呢，真是個百年不遇的良機。

那末，中國歸化問題現在到了什麼階段了呢？距離我們的目標還有若干路程呢？將來可有何種改進的方策呢？這些都是我們應該深思熟慮認真加以檢討的問題。

當然，今日的傳教事業，確實不能算沒有進步。教友數目，一天一天在增加；每年十餘



萬成人的受洗，也不能不算相當可觀的成績。可是個人單位的歸化，究竟還不能全它當作唯一的重要事業，不能算作最主要的工作。即使把現有的教友人數，再擴大到一倍以上，那對於整個的中國歸化問題之本質，仍屬無關，也只是量上的差別而已。實際所謂中國歸化也者，却是要把福音的原則來滲透整個的中國社會；是讓中國全國個個大集體，明白地認出人生意義；是讓偌大一個民族的文化突飛猛進；使它對其自身的超性使命有所瞭解。那末，請問公教教義之滲透中國人思想及其影響於中國國家的發展究竟到了什麼程度了呢？

現代中國的積弱演化已是不可否認的事實。近數十年的青年層口口聲聲在喊着革新，也不是無的放矢。他們所謂革新，初不限於辛亥光復推翻滿清政府的那宗政治運動。這種革新却是有着較此更爲深遠的含義。那就是將過去形成中國之所以爲中國的一切思想，一切傳統，一切體制，予以全部的推翻，或至少予以重新估價。這恐怕是世界有史以來一個稀有的民族狂潮。並且這狂潮激盪所至，初不限於沿海各大都市或某一個特殊階層。它對於任何體制任何人民階層，對於整個的社會集團，都發生了極大的影響。甚至連窮鄉僻壤的農村，也都多少受到了它的波及。

這個革新運動全仗着少數受過新思想洗禮先知先覺者的苦幹，才有今日。他們最初是恍於本國屢遭挫辱局勢險危，又鑒於西洋各國的繁榮強盛，才臥薪嘗膽地努力奮鬥，想把自己的祖國從數千年的積弱裏拉出來。那真是一種艱苦卓絕所謂死與求生的奮鬥。試想中國之大，有着

四萬萬以上的人民，數千年的歷史背景，再加上一個表面看來牢不可破的傳統精神，種種困難似乎絕難克服。然而他們終於排除了這些險阻，完成了他們的任務；終於撼動了這龐然大物。整個的中國，終於受了他們的推動，開始向前邁進了。

這在傳教者方面適逢其會，真可謂千載難遇的良機了。所謂啓蒙運動確實是發軔了。而推動它的，又恰巧是受過西洋思想之薰染的一羣。他們的思想，他們的信念，多數是由西洋公教化的民族中灌輸而來。這些民族的楷模，對於他們的行動，有着莫大的影響。那末，曾經陶冶過西洋諸國文化的公教教義，似乎也應首先浸染到這些領袖，再逐漸浸染到全國人民了。

然而事實竟有大謬不然者。他們由西洋各國所得到的東西，竟大半是些唯理，唯物，無神，共產的理念。本來這次啓蒙運動，應該使他們與公教教義接近的，結果反倒愈使他們遠離，真是可惜可嘆。

此中消息端在於他們中間的多數人對於公教教義的認識，只是由於公教被攻擊被譴蔑的一面。西洋人使他們誤信着：宗教不過是一種歷史陳跡，不過是中古黑暗時代的殘留物；是與現代進步不能相容的一種障礙；不過是資本家阻礙社會進化和民衆解放的一種工具；總之，不過是現代有識者所不屑齒及的一大堆迷信把戲而已。

於是這種思想便透進了中國青年界。舉一個顯明的例，北平輔仁大學的公教生僅佔全體十分之一。其他除去少數誓反教徒和回教徒外，幾乎全是無宗教者。還有他們的入學報名單可

證。

不錯，中國是有新發展了。它的智識份子已經擺脫了傳統的信仰。但代替這信仰的却是一個否定。它的新發展是在聖教會的影響範圍以外進行着，甚且每與教會作對。（註一）

故此中國歸化問題，亦即中國本格文化之公教化問題，整個地尚待解決。可是由於中國文化的轉變距其最後終點猶然遙遠，所以目前要想利用時機，還不算太晚。照一般情形看來，我們可以相信，中國經過這場試鍊，因戰爭而起的劇烈變化，定可幫助它幡然覺悟放棄過去的過激的唯物的理念，去另尋一個對自身精神生活較為健全，較為安定，較為充實而向上的基礎。世界各國經過這次大戰，定可引起一種大的轉變，使物質文明所發揮的暴力，與公教文明的道德價值，成一顯著的對比。羅馬教廷的聲勢與道德力量，從來沒有像目前這樣強大。教宗的人格為萬國所尊崇。中國方面，自不能不注意到此種轉變而受其波動。

至於中國公教會自身呢。目前設施亦已比較完善。三個最高學府都辦得非常有趣。前途或許還不免遭遇若干困難，然而它們的存在，似乎已有了相當保障，在國內教育界，也有了相當聲譽。若能善為利用，必可在中國文化的發展上產生一種深刻的影響。

但願中國的前進份子個個明瞭，惟有公教真理，才是一條正路，能儘量發揮民族的優點。惟有浸透了公教精神才能使本國得到長足的發展；惟有接受了它的教訓，才能自儕於領導地位的文明國家之林，才能對於世界其他部份發生深刻的影響。實際上，問題的關鍵全在於此。青

年中中國熱烈地迫切地要求着自身的進步與強大。假使它能覺悟此種進步與強大的秘訣，就存在於公教信仰中，那末，它會以何等熱情來信奉公教，進而助其廣揚呢！

設法讓它明瞭這個，正是我輩的責任。爲此，我們得利用一切機會，使它認識公教文明的眞面目，並指示給它，公教真理對於它所思慮的各種難題，能貢獻出如何良好，如何圓滿的答

案。

如何去感召中國的思想界，幫助它發展，如何逐漸地使它滲透公教的精神，如何讓它接受公教的人生觀，和基督授予世界人類的生活方式，這才是個個傳教士所關心的大事。爲使整個中國公教化必須先由智識階級漸及於一般民衆。那末，這文化傳教事業實是一個頂重要的問題，既應時，又迫切，併使們無從規避。

誠然，在目前的緊張時期，一切注意力都爲戰局所轉移，因而一切哲理問題，文化問題，也都被列爲不急之務。然而一俟戰事結束，自會重新恢復其重要性。到那時，我們公教徒對於文化傳教的進行步驟，應該準備就緒。故此，我們目下就該想到這個問題，加以研討，並預籌各種應用方法。

這篇文章就是因此動機而寫成。我並不想把這問題以及它的答案，澈始澈終地闡述無遺。我的目的，祇想對傳教工作中如此重要的一面，引起一般人的注意，並提出若干意見，試作若干建議。即使這些意見和建議偶有不甚成熟的，也不妨姑且加以探討，或可藉此覺得較好的解

(註一)

當然，誓反教派因爲多在大都市中活動，仗着多數高等和中等教育機關，多少發生了一些影響，收錄了若干教徒。然而那不過是極渺小的少數，終難阻止全國唯理思想的發展。在過去，他們對於公衆生活所發生的影響是微乎其微的。

第二章 新聞事業

第一節 大都市的報紙

我們的目的是什麼？是使中國公教化，是想把福音的種種原則，透進全國人民的思想和生活裏。那末，用什麼方法來達到這個目的呢？自然得把這些原則向全國人民提出，一方面指示他們在日常所最關心的問題上，如何應用這些原則，並證明這些原則在他們精神生活的革新上，以及他們社會生活經濟生活的開展上，較諸其他任何原則，都來得高超優越。

那末除去言論機關以外，還有什麼更好的方法能直捷地，不斷地，向全國人民，向智識份子，向一般平民，發表自己的意見呢？

所以報紙一物才真是現代式散佈思想的偉大工具。它可以討論到有關宗教生活，精神生活，社會生活，經濟生活的一切問題，亦即全國人民全部生活的一切問題，無論大小，都不出它的範圍。它能反映，也能訓練全國人民的思想。它能創造民意，能形成，領導，或改變各種思潮。在任何成爲問題的問題上，普通民衆的思想，每受報紙的評論的左右。任憑你是如何有思想有見解的人，也難逃出它的暗示。所以一般極權國家，對於新聞的統制，無不異常嚴密。甚至利用言論機關，作爲自我宣傳的工具。現代各種思想，無論是納粹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

義，或任何其他理論，都是藉了言論機關的努力宣傳，才得以深入人心。

你要在中國宣傳公教思想嗎？要把公教思想透進各個場合，各個社會層，把它滲入公衆生活裏嗎？那末，除掉創辦大規模的新聞事業，沒有更易於收效的方法。有了言論機關，才能把公教對於當前問題的解決方案，逐日地提示全國。新問題不斷地被掀起，被討論，你也可以隨時藉着自己的言論機關指出最好的答案，同時並對於偏僻的學說，糾正其錯誤，指摘其危險與虛妄，使國人知所警惕。有了言論機關你的影響力便能日浸月潤而微而漸地發生作用，並能適應任何時期的需要，任何時期的心理。有了言論機關你便能加入公衆活動去爲他們分憂，去響應他們的願望。有了言論機關，條件能乘着國家事變，國際事變，來昭示全國人士訓練他們的思想。

所以到戰後我們必須首先將一大部份的努力用到公教新聞事業之建設與發展上。而且這新聞事業的對象應是一般的國民。現在的問題，不是再替自己的教友添辦若干報紙（註二）到現在爲止，我們的報紙和刊物幾乎完全是自辦自看的。我們如必要創辦新興報社的話，應以促進全國公教化爲宗旨。所以應儘先以教外讀者爲對象，一切設計都針對着這個目標。那末公教報紙既要逐漸改變這些教外人的觀感，最好以何種方式去設計，去編輯呢？究應如何去迎合他們的心理，遷就他們的見解，適應他們的要求呢？這個要隨機應變，揣摩輿情，竭力避免太露骨的宣傳。否則咄咄逼人，是要使善意的讀者望而却步的。話雖如此，公教新聞

事業的最後用意，究竟還是以散佈公教思想使全國逐漸歸化爲其指歸，這自然是要時刻留意的。

所以公教報紙，仍應以主義思想爲重。必須隨時涉及現代中國一般人急求解答的問題。必須參與各種文化運動，加入各種論爭，必要時不憚發動某種論辯。

可是對於本位的報道工作，也應當力謀組織上的健全活潑。即使不能凌駕其他同業而上之，至少也不應稍有遜色，其他技術方面，如採訪，專電，編排等等，也都要能與其他第一流的報紙工力悉敵。開辦初期，也許，甚至說大概，難以一蹴而成，達到此種水準。然而不妨預定以此爲目標去悉力奔赴。過去唯一公教日刊的益世報，在全國同業中，始終保持着優越地位。此次戰後遺希望它能在津復刊，並恢復北平分社。或將總社改設在北平，分社設在天津，似乎更爲合適，因爲北平畢竟是華北的最大的都市。

在華中和華南，也該各辦一個類似規模的大報。至於地點，在華南似以香港或廣州爲較宜；在華中南京無論如何該有一個大報，有餘力時上海也來一個。

讀者大概要反駁我：「這些計劃有點太誇大吧。」當然，我自己也很明白。然而我們必須把企圖提高到事實需要的地步。我們真要——實際我們本該——使中國公教化，要把公教真理逐漸透進全國的話，僅靠華北一家大報，甚至華南再來一個大報，也決不敷用，華南或華中各文化中心，以及附隸於這些中心的省區，怕會漏掉我們的新聞網外。我們的初願，不是想該

中國全部領域，都接觸到公教思想的傳播嗎？

實際上，主要的還不見得是經濟問題。經濟問題固有其重要性。然而那寧可說是一時的問題，僅限於創辦時期。要知道一個報社，如能籌備妥貼，經營得法，並不難自足自給，甚至還有利可圖。不過一方面要議論正大，報道精采，引起人家的注意，一方面要多撥廣告以資挹注而已。

最大的難題，怕還是人事問題。到哪儿去找這末多的公教人材，去主持，經營，編印，那末多的日報呢？我的答覆是：在報社的整個組織裏，有若干不同的部門；普通都分營業部，排印部，編輯部，經理部等。前二部很不妨聘請教外人幫忙。連其他關於採訪消息，和撰著政治，經濟性的社評，以及其他無關宏旨的文稿，也都無妨由教外人去負責。以上已佔去了報社入事的大半。祇剩下有關公教立場的文稿，才需要公教內有識之士，或選由神職界人物去執筆。然而即使此類稿件，也能設法特約思想穩健的教外人來幫助撰述。至於神職界人士，如果有意給報社幫忙，儘可隨時撰稿寄社，並無需拋荒了正務。祇須對於當前重要問題，以及各方面新發表的東西，都大概熟悉，又有相當寫作能力就行，所以在開辦時期，只需幾個能負責，有才識，肯出力的公教人，佔在指揮地位，給報紙印上一種特色，其餘可無問題，自然對於編輯或主持所有的公教報紙，公教刊物愈來愈覺得需要多數的公教人材。正以此故，我們要多努力，在公教大學和修院裏栽培此項人材。這是顯而易見的事，下文再常詳論。

公教報紙的宗旨，應是致力中國的強大與繁榮。為達此目的，竭力去尋求各種方案，推動

一切有效的策劃。正因吾人深信基督所傳留的道理，是唯一能把中國領到這國目標的途徑，所以才要把福音的真諦介紹給它，作爲解決一切難題的準繩。不僅是宗教問題，連它所遭遇的任何道德，哲學，社會，家庭，教育等方面的難題，亦無不如是，公教報紙應對於本國過去歷史和社會體制寄予最大的興趣，最高的重視，最深的同情，並具有最誠摯最純潔的愛國情緒，對一切突發問題，雖不必故標極端的國家主義，但應從中國觀點出發，以增進中國權益爲前提。

至於純粹的宗教宣傳，如勸人進教受洗等，最好避而不談。因爲這類勸告，只有對於研究有素心悅誠服的人，才覺適當。在他們尚未感覺需要以前，這樣敦促的勸告，在受之者的眼光裏，很會認成一種冒失的舉動，一種心理上的強迫。我們只須設法讓公教的原理透入人心，只須把基督所傳解決人生問題的各種方案一一提出，讓一般人對公教人生觀加以玩味、重視、和景慕。那末，他們不知不覺中自會逐漸地歸向基督歸向公教了。

反而言之，也並非說，我們不必抓住一切成熟的機會，去顯示公教福音對於西洋文化發達上所作的種種供獻，以及教會在各方面的影響，活動與成就。我們要謹慎而不畏縮地讓大眾認識基督的真理和公教的真面目。

第二節 各地方的報紙

爲對全國智識階級和統治階級發生廣泛的影響，而在大都市創辦大報，固屬絕對需要；但對各省區和鄉村作分區的宣傳，則較當地方色彩的小型報，也非常有用。個人以爲這類小型報的讀者，既較有限，固定，而單純，其創辦自亦較易。全國整個的民意和輿情，及其經濟上的，精神上的，種種需要，固然不易把握，適應；但若祇以一個省區，或其他較小範圍的讀者羣爲對手，那情形就簡單多了。

一個地方報紙的成敗和影響，全看它能否迎合該地方民衆的願望，能否滿足他們的需要。因此必須對本地區內各個階層如：農民，工人，手藝人，商人，教師，公務員等的物質生活，精神生活，加以研究，看報社對於他們每一階層，能作何種服務。尤其對於當地農民，要特別注意，對他們的利益，特別關切；設法供給他們經濟生活中所需要的一切情報，例如：附近集市和省會的糧食行情，耕作和家用物品的時值，年中各季雇工的代價，中央或地方關於捐稅徵收等法令的實施分際等等。這些事情都是農民所最關心的。此外，還有若干因地而異的個別需要，不能遍舉。總之，我們要博得當地人民的信任與歡心，非但要注意他們的精神需要，更要注意他們的一般需要，一般利益。這樣一個辦理有方的地方報定能增長公教在當地的聲勢，定能謀一方的福利，並擴展自身的事業，你有意添設學校，創辦民協會、儲蓄會、貸金會

、或其他社會事業嗎？若先有一個地方報，代爲鼓吹；就能使你的活動範圍較爲寬大，工作較易收效。聖教會被人攻擊的時候，可以由地方報紙來自衛。教會的種種事業，可以藉地方報紙來使人明瞭重視；事業需要支援時，可以由地方報紙來代爲陳情。至於本格的宗教宣傳，更可藉它作強力的工具。不過這類文字，不必在報紙正張內發表，祇須每主日出一張公教副刊，名義上專備教友閱讀的。既然不是給教外人看的，他們也無從啓疑。實際上他們受好奇心驅使，只有看得更起勁。這類副刊的內容，不應純以教訓，陶育教友爲限，同時也要能藉它來開導・感化，非教友的讀者。（註三）

地方報的第一目標，既是關心，支援當地民衆的具體權益，那末按理自然是辦得越多越好。可是也要提防效率的增加，被精力分散的損失給抵消了去。所以最好的折衷辦法，怕還是每省區創辦一個總報社，再在每一教區內設立一個分社。分社裏各有通訊員若干人，假定是每縣一人吧，讓他們負責將本地消息，和本地個別需要等，陸續供給總社。這樣可使一張報紙，合之則爲全省的，分之則爲各縣的，各方面都顧到了。（註四）

還有一件事，也非常重要就是無論是新聞社論，都要用極其淺顯的白話文。我們的言論應當是平民化的，並應使其普及於大多數的民衆。得讓大家都容易明白，都容易領會，從而發出一種真正效力。或許因此而遭到自命風雅的智識份子的藉口輕視。但真正眼光遠大，思想新穎的智識份子，定對我們遷就大眾文化程度的努力，予以贊同。況且中國智識界最優秀份子，如

胡適之先生等。一向就主張儘量可能，使報紙文字語體化；甚至要求都市報紙，也都要採用語體。必須這樣，才能有效地輔助民衆教育，使之發展。一般成人，在少年時代，多少識了幾個字，就從舊報報架增廣見聞。一般農民，因為注意報上登載與他們有切身關係的經濟消息，也覺得讀子弟上學念書是很有用的。實際這類地方報紙的使命之一，也就是提倡平民教育。例如平民千字課，義務學校，以及增進農民的農業常識等，都是屬於同一範疇的。

〔註三〕 參見一九四四年一—四期公教教務叢刊頁八三；司神父 F. W. H. H. 著「農村社會事業綱領」。

〔註四〕 又凡屬公教報紙，都要彼此合作。關於新聞資料和時論特稿，要互通聲氣，時時處處，和衷共濟。這是彼此有利的。

第三節 與教外刊物合作

除了創辦新的報紙以外，另有一件似乎同等重要而有意義的事，就是與教外期刊合作。這種合作，可以是經常的，也可以是偶然的。個人認為凡公教徒被邀參加一種教外刊物的編輯，不可錯過這種機會。這是一個良好的講壇，可以藉它對一部份羣衆灌輸公教思想，否則這羣衆我們便無從接近。但是除了這等近乎例外的長期合作之外，我們還要抓住一切可能的機會，

在這類教外刊物上發表文章，使一般人得知公教解決現行問題的見解。主要的是時常窺伺着這種機緣，而加以利用。譬如言論界突然爭論着某項問題，頗爲一般人所注目，這便是啓發我們的機會。慣例一般報紙刊物對於一個新聞問題的發生，歡迎各方面參加意見，以求最好的解決方式。所以我們要善於利用這種情勢，乘一般人注意的時候，去闡明公教的論據及其附帶的解答。

遇到其他國際大事件，或各社特殊消息，成其時髦課題，也是我們發表意見的機會。譬如常見各通訊社電稿中。有涉及教廷和教宗行動的地方，教外人士對此類消息，相當隔膜。我們不妨隨時喚起人們的注意，在發表這種消息之後，接着撰著論文說明教宗是何等人，以及他的人格，地位，使命，權力等。又如各社電訊提到歐西各教會團體，修院，教區，或公教界動態，如年會，主教大會時，亦可如法辦理。

又關於這事，希望各通訊社，此後對於世界各地公教生活之類的消息，儘量供給。這樣才能使公教精神特殊顯露，讓一般外教人知所注意。或者歐美方面，可以發動一下看。

然而除去上述撰著論文，與教外刊物合作的方式以外，還有別種方法，可使公教勢力向外發展。就是以公教方面的資料，供給教外編者，讓他們明瞭公教的立勢。這些編者中，定有若干思想開通的人，誠意謀本國福利，正在尋求着真理。我們去幫助他們發見它吧。（註五）

自然似此方式的合作，非有相當交情不可，這個忙，非知己朋友間是幫不上的。所以我們主張平時對新聞界和作家們要有相當聯絡，獲得他們的好感，影響他們的思想。這也是其中原

因之一。這個問題非常重要，下文當另章討論。

創辦或主持一個報社，自非每個公教徒，神父或信友，所能勝任。但是個個人都應該關心公教報紙，與以相當鼓勵，在可能範圍內參加合作。每個人都能幫助推銷公教報，尤其是向教外人推銷。每個人都能對公教新聞案中樞或公教報社，提出種種有益的建議，使這些機關明瞭它們所欲觸動的羣衆都有些什麼需求，什麼缺憾。或自願加入爲某地通訊員，經常爲報社寫地方通訊。有的人，可以幫助各報保持相當水準，並將應批評或駁斥的新出書報，提示給各該報社。還有若干人——但願這類人越多越好——可以針對時勢需要，適應讀者心理，撰投文稿。因此，我們個個人都要設法去研究社會心理，緊追現代潮流，並瀏覽新出書報。公教言論界的效果，全視其能適應當時需要與夫羣衆心理到如何程度而定。

這些言論機關，固然非到戰事結束無法籌辦，可是自目下起，就該開始準備，創辦一家新報社，是一樁大規模的企業，非事先有精密的籌劃不可。我們必須在戰事結束以前準備竣事，戰事一完立可實現才行。我們要搶到前頭，不可讓別人捷足先登。這樣才能增加我們的成功機會。因爲，首創第一家新報，是一回事，與其他根深蒂固的報去競爭，又是一回事。其間難易不可以道里計。所以我們要趁目前環境，大家共同商榷，促其實現。

(註五) 我們目前已有一家通訊社，以全國新聞界爲對象，頗有發展希望，過去也頗多

建樹，就是所謂補充通訊社。該社於一九三三年由D. J. 神父創辦，受公教教務聯合會監督。

該社發覺的對象有中文公教報紙期刊五十家；外籍公教報刊二十四家；非公教者七家；又國外刊物十九家，通訊社七家。每星期發稿一次，約十餘頁。大半爲全國各教區的消息，其餘是世界各地公教界動態。上次在滬召開全國公進代表大會時，所有會場消息，逐日均由該社發登該市各報。

此次戰後該社對於教外報刊的聯絡，似應再加擴大。事先要對每一教外刊物的特殊情形，加以仔細研究。然後分門別類地斟酌發稿。譬如某報可以披露公教教義類的消息，某報可以發表教會函信與一般公教界動態的消息，某報僅能採用涉及社會，教育慈善專業的消息，還有的只肯採用略帶刺激性的新聞等等。若能以此等方法或其他分類方法編發稿件，或者較易爲每個個別報社所採用。

第三章 出版事業

第一節 創作

日報與期刊之外，另一種文化傳教的方法，便是書籍的譯行。本來我們是奉聖教會的使命，把基督福音，傳到中華全土的。但是用什麼方法，才能向四萬萬廣大的羣衆去講述一切呢？縱使我們如何努力，向教外人舌敝唇焦地去說法，只有一大部份的民衆，尤其是智識界人士，非我們的口頭宣傳所能及。所以我們可以另想一種方法，就是出版各種書籍，俾非公教人去閱讀。

這裏有一個先決問題：我們是否已經有了這類書籍？我的一翻香港公教真理學會出版的「全國總書目」，馬上可以看出這類出版品確是不少。是嗎？公教著作家出版書，節已作了很大極可稱讚的努力。尤其公教傳教士，散處四方，有的在很遙遠的鄉村，與文字工作不可或缺的大圖書館完全隔絕，祇靠自己赤手空拳去想法，尤覺難能可貴。可憐若再一網打，便將這些出版品的大多數，幾乎全是爲信友，或教理先生，以及中外司鐸們而編著的。內中只有極小的一部份，是爲教外人看的，可惜又是初期開教時的作品，至於現代著述，適合現代中國思想，討論現代中國問題的，真是稀而又少。

然而中國的新人物並非不愛看書。不信，且看各大都市的舊書店琳琅滿目的貨架。再翻閱一下各出版家的目錄，便可明白。近幾年以來，各科新書都有大量的出版。書商營業，也都十分發達。可惜他們販賣的東西，不是內容有問題，就是乾脆害人。

共產思想在中國的傳播，特別是靠了書報的力量。在中央認真取締以前，上海，北平，和其他都市的書店裏，到處充斥著左傾的讀物。左派作家也結成同盟團體大肆活動。在他們的組織裏有著才情卓越，通國聞名的作家。這說明了，何以共產主義會在中國傳播得如此其速，何以中央政府要那麼吃力的去遏止它。

煽動階級鬭爭，鼓吹憎恨破壞者，所用的策略，我們也要用它來散佈基督的和平，愛情的福音，並用它來復興中國。所以我們要努力寫作，要大量生產良好的讀物。我們若能印出內容精采適當需要的公教作品，使每個中國智識份子都能人手一編，那才算中國的公教化有了眉目。

書籍之勝似語言與報紙的地方，就是能隨時一編在手，反覆誦讀，並能對任何問題澈底研究，多方觀察，並較易深入更多的階層。

我們最需要編印的是哪一類的書呢？答覆是：「那些所能發揮較為普遍，較為深刻的力量」的。所以就是那些最能適應現代需要的，理論方面的書，那些能替中國解決目前難題的書，那些引導中國人考慮人生究竟的書。

第一，是辯教類的書，但必須適合中國國情，並須切合今日中國國情才行，我們不能把西洋各國教會中學或修院裏所通用那種標準教本，原封地搬運過來。必須把它改編一下，使合中國之用。一本給中國人看與辯教書，決不能仿照歐洲某國或其他地方譬如印度所用的題材去編寫。應該顧到中國讀者之理解力，由他們熟習的事理出發，而以其本國的哲理，文學，和歷史資料，作參考，作例證。

非但國情要顧到，時代背景也要注意。現在作辯教書的，不能抄襲早年開教時期，以當時環境爲對手的舊文。那是一種錯誤。首要緊的是，辯道類的書，必須具有現實性，並與中國的今日情況，保持不斷聯繫，解答著目前的難題，控制著時代青年的注意。在我們編著新的辯教書時，事先必須博覽羣籍，尤其新書報等。要對現代小說家，現代社會學家，現代哲學家，所提出的問題，給以答覆。一個辯教作家於著手寫作以前，應該一般特出的報紙雜誌，作深長的探討。必如此，他的著作才能合乎時代，有生氣，有趣味，才能有效的感動教外讀者。

正如師神父 (Fr. MacArthur) 在香港版全國公教書目裏說的，另有兩類出版品，尤須特別注意，就是小說和社會問題兩類。原因是討論社會問題的書，最能引起人們的興趣。大多數現代刊物都在討論著各種社會問題，家庭問題。最時髦的作家像巴金，老舍，矛盾等人，也都從這些問題裏找小說材料。而共產主義的流行，一部份可由社會思想類新書的狂銷來得到解釋。

所以要想在現代中國推進公教勢力，這正是一條現成的路。假使能够讓新的中國明瞭公教

的社會理論，讓它贊成公教對現行問題提出的解答，便可有效地破除種種成見，使國人接近公教，並從共產主義舞臺下陷於無政府狀態的危局裏，把他們解救出來。

社會問題，家庭問題，固可藉專門著作去討論，同時也可由公教文藝作家們，以此種問題爲中心，發表新體小說。在現時中國，多數人都充滿成見，而真正學者又極少。所以含有公教思想的說部，無疑地是最良好的宣傳工具，能將正確思想注入人心。一部好的小說，必須以公教人生觀爲背景。在故事的發展中，隨時穿插着現代問題的討論。本來，一般太專門，純學術性質的文字，很不易受一般平民的歡迎，印數決不會很大，銷路也決不會很暢。小說則不然。因爲故事的引入入勝，不知不覺間，便起了潛移默化的作用，並能深入各階層。一部寫得好，能動人的小說，即使以公教思想爲題材，一樣也可以風行一時。實際上任何新人生觀，任何或好或壞的主義，都可以藉小說的力量傳播出去，深入人心。我們要利用這種心理，利用這種方法，去傳佈公教思想。

我們可惜在過去，一直忽略了這個文藝形式。不信，試翻一下香港版公教書目。儘所有的公教小說，也不彀組成一個小小文庫。

故此我們的公教作家們，還要及時努力。他們的領土是廣大的。他們在公教文化的發揚，傳教工作的推進上，充着極重要的角色。我知道他們的人數太少了。然而好的作家，在任何國家都不多。我們必須去發掘他們，造就他們，獎勵他們。外國傳教士有中國教內作家的合作，

固可作出些成績來。例如早年由入華教士口授中國學者潤色的書，在當時就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可是文藝作品，不比其他，天然的主角還是中國人自己，是神學界作家也好，是在俗的作家也好。我們要從各修院，各中學，各大學的公教青年羣裏，發掘有文藝愛好的人，幫助他們發揮自己的天才，給他們學習的機會，盡所有力量去鼓勵他們。切忌用否定的批評或輕視的冷笑，去妨礙他們的發展。總之，公教青年的文藝修養問題，應在公教教育者的心事中，佔據一個重要位置。

自今日始，我們就該着手網羅公教作家共同努力。現有公教作家，固不算多，也不能說太多。例如里昂留學歸化公教的蘇梅女士，其作品曾徵選入教科書。近年入教的吳經熊博士，曾著有「小德助撒研究」，先在英文「天下月刊」發表，後另出單行本，為世人所傳誦（註六）。又如新近輔仁女大的張秀亞女士，其自敘徵依經過，非常動人。此外，如李博多周信華諸司鐸，都是斐然成章的作家。還有很多姓名，不及一一列舉。

為努力發掘新人，增產新作起見，其教士曾作下列建議頗有善義。就是設置文藝獎金應實徵求作品。應徵的人，就若干題材中，自由選定一題去發揮。另外組成評判委員會審查應徵稿件，頒給獎金。個人認為此種辦法，頗值注意。此外更願便一提的，就是要想鼓勵公教作家在雜誌報紙內踴躍投稿，就得對稿費問題更加考慮，方是正式辦法。即使是開精神上的鼓勵不談，一個作家，在生產之前，需要大量的參考書，這是很費錢的。一種作品，自開工到交件，又

需要時期長久所費不貲，準備。至於我們尚在俗作家，更理應能靠筆桿收入，維持生活。所以採用的稿子，至少該論頁或論行計劃。書籍出版後，必將著者抽出若干成的版稅。

(註六) 原名 *The sentence of Love* 香港公教真理學會出版。又 R. P. Moynihan 有「

吳經熊先生近著研究」一文載公教教務叢刊一九四一年四月號。又畢神父 P. Berens 有「燕雪林研究」一文，載靈且譯誌新第二卷。以上兩位批評家，曾在靈且雜誌中，陸續發表現代中國作家評傳多篇。希望他們將來能出一總結集，以便教士參考。這對於公教與新中國間的文化交流上，定會有若干供獻。

第二節 譯 述

發表創作，固然最適合現實的中國國情。然而外國著作的中譯，雖屬次要，仍不失為是一種迫切的工作。要認清此點，祇需看一看此類譯本的風行，就可明白。從各大出版社的書目裏，很可以看出這些譯本的數量，如何之多。可惜大多數即使不至真正有害，至少都缺乏着公教思想。而共產思想，無政府思想的傳播，一部份是藉了俄文原著的中譯，那也是事實。

佛教徒的先例，頗饒興趣。佛教本是自印度傳入的外來宗教。它的流行中土，發展到成爲

中國一種普遍宗教的資格，是用了什麼方法呢？主要還是得力於梵典的逐譯與改作。在公歷七三〇年左右，已有二二三〇種釋典，譯成中文（註七）。

公教真理學會的全國經書目，對於西文公教書的中譯問題，也有可資參考的地方。過去譯成的書，固有相當數量，有的也很不錯。可是這方面的工作，無所請止境，足有我們繼續努力的餘地。

譯書事業雖說艱苦，比較還容易著力。像專門性，理論性的原著，翻譯時固要字斟句酌，準確忠實，至於其他作品，例如小說之類，便可較比自由些。我認爲與其咬文嚼字的死譯，還不如明白曉暢的意譯，比較容易當，容易讓民衆愛讀它。

關於翻譯工作，我有兩個建議。第一，在各大都市與北平上海天津和香港等地，必須組織一種翻譯委員會，負責給予習作者種種指導並審查其譯稿。譬如一位中國神父，或在俗的人，想譯一本書。他本人或他的主管人，應該向什麼人去徵求意見，商量文體呢？總得有幾位有眼力，有權威的人，像大學教授或中學教員之類的，加以鑑定。他們應隨時給予譯者若干指正和忠告。譯就的清稿，也應由他們，或其他權威的人員，加以最後校訂（註八）惟有這方法，才能使都市以外，無參考上便利的紳職界，或在俗的人加入合作。

其次，就是對於擬譯或在譯中的書，要成立一個中樞的諮詢聯絡機關。譬如一位熱心文化的司鐸，想利用工作餘暇，譯一本西書，究竟該選哪一種好呢？這要負有指導青年之責的人，

爲教師或神師者事先覺察，需要某一類的讀物或譯本，隨時預告中樞機關，以便遇有作家或譯者，向它徵求意見時，可以予以有益的指示。又如有人見到一本有意思的書，認爲值得一譯時，也可以提示給這機關。他如譯事人材的徵聘與獎勵，文字的商榷，意見的轉達等，也都可由這機關去負責。還有，凡有在編譯中的書，其關係者也該隨時通知這機關以免彼此雷同，浪費精力（註八又）。

一件小故事，可以證明上述聯絡機關的功用，一位喪失自由的傳教士，想乘著餘暇，譯一本法文小說。他看著巴贊的名著 *Le Bébé* 很不錯。才要動手去譯了，忽聽人說，這本書已有中文譯本，或改作本。於是他中途更張，又想去譯步爾齋的 *Le Cens de la Hor*。不料臨時又有人告訴他，這本也有人譯過，已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我們還聽說，南方有一位神父，預備翻譯魏曼斯的 *Mein*。誰知這書竟已有了三種譯本？像今日這樣專浮於人的時期，這豈不是很可惜浪費精神嗎？（註九）

在入選的應譯各書裏，我們要先儘那技能引助智識界人歸向聖教的書去譯。這箇大目標，我們心目中要時常注意。我們要把最善的努力，用到這個上頭，尤其因爲早先在全部傳教計畫中，這是最被忽視的一件事。正如上文所說，爲教友用的敬禮書，道理書，已經出得很多了，可是能給待勸化的教外人看的書，幾乎沒有（註十）

(註七)

聖母聖心會，賀登瀛神父 P. Craddock 在故都任教，與司禮遜神父 P. S. Smith 合著「中國史講義」已脫稿，戰後可出版。茲摘錄其中論佛教東來一段如下：

「佛教在華流行的另一助力，就是多數梵僧自印度和西域東來與其鉅量的譯述工作。並且因了他們中最優秀的漢文程度，也很平常，所以就約了很多的中國人，合作筆述」云云。

希望佛學專家們，對佛教流行中國的經過，以及當日所用的方法，發表一些研究文字。我相信定能給予我們若干有興趣的啓示，作中國歸化公教運動的參考。

(註八)

香港的公教真理學會已開始辦理此種事務。

(註八又)鐸聲雜誌第三卷第六七期曾有一次極有意義的創舉，就是吳宗文神父試列一張「應譯的西文神修書目」。聽說後來又仿此辦法，開出一張專給教外人看的「應譯書目」來。

(註九)

關於此點，可參看一九四五年公教教務叢刊頁四一桑世希神父 R. P. Ieyssen 所著「傳教士合作問題」一文。這篇文章裏，有幾種建議，與此處所論者互有關連。兩篇不相爲謀的文字，竟會所見略同，豈不是時代的信號嗎？

(註十)

本文專論對教外人應做的文化工作，有幾句話，雖然超出本文範圍，也不妨順便一提。就是一般公教圖書館如修院園，公學園，大學園，或民衆園對於文學書的選擇問題。記得有一位天津工商學院的講師，曾說這簡直是個無法解決的問題。我們已出的有意思的文學書，實在太少，沒什麼值得給人看的。

故此，我們一面要用盡全力，去鼓勵好小說的創作，一面也要努力翻譯外國的名著。

不過，要注意，除了公教書局所發行的譯本以外，還有不少其他書局出版的譯本。香港版「全國書目」裏就有商務，中華，讀學會等出版的譯本一覽表，數量意外之多。像巴比尼的「基督傳人」和「蕩子回頭」都已譯出。還有步爾齋的「門徒」，笛福的「魯賓孫飄流記」還有都德，狄更司，司考脫，遠夫特，庫柏等人的著作。類此的譯本調查，似乎可以做得再精到些，那是很有用的工作。

此外，聖母聖心會善乘仁神父 R. P. G. G. 和幾位神父仿白冷氏「宜讀宜禁小說目」體例，合作編纂着一種「現代中國小說總目」。還有耶穌會冀神父 R. P. Chyvalink 也編了一種油印本「中國舊小說選目」，都是一般人可看的書。還有上海開明書店出過「潔本小說」若干種，將猥褻或不妥之處，酌

量雖步這是以教外人道德立場做成的工作，似乎仍須加以檢核。最後，公教真理學會也預備編印一種報告公教出版消息的刊物。希望這種創舉在戰後仍能繼續，形式倒不拘。但若擴充到其他司鐸信友們無妨閱讀的教外書報，那就更好了。

第三節 公教書籍的流通

到過北平書業區的人，可以看到麇聚不絕的書舖和書攤。或許你受好奇心驅使，想調查一下這些攤上，究有多少種公教出版物供人選購。尋末，請你好好去找吧。若非十分細心，難得在舊書堆裏發見一兩本，不知怎麼偶然流落在那裏的。實際在正式的新書市場裏，公教書是完全絕跡的。如此現象能不教人心裏有點不快？

北平如是；天津，上海，或其他城市，大概亦復如是。結果，愛讀書的教外人，常跑書攤的，很藉藉此認識公教真象，得知公教對一般問題的態度。更有甚者，他們竟會因此而假定教會對這些問題並不注意，理由是豈沒見它出版過關於黨方面的書，試問教外人中，向公教出版機關直接訂購書籍的究有幾人？知道有這些公教書局存在的，又有幾人？

爲什麼緣故，國內書籍販賣商，與各地出版家都有批發往來，惟獨對公教出版機關却不知

注意呢？我認爲這有兩種原因，第一是我們廣告宣傳做得不敷，第二是他們推銷公教書無利可圖。

若說我們的出版宣傳毫不努力，那也是冤枉。每個公教書局都有詳細目錄，凡遇大批發貨，都附入一份。這是個很好的宣傳方法。並且，每逢新書出版，必特印小張廣告，大量地夾入信件裏。還把樣本分寄各公教雜誌社請求批評介紹。最後，還有公教真理學會出版的全國總書目，將各公教書局的出版品，綜合編入。這辦法更爲完善。

不過，以上各種廣告方法，對於神父教友們，固然十分有效。但是否能普及到教外主顧呢？恐怕很難。因爲過去的宣傳對象，祇以教內爲限；外教人絲毫不受影響，因而對公教出版物也異常隔膜。實際我們宣傳的目的，推銷出版品的對象，還應以教外人爲主體。所謂傳教者，不就是向教外人宣傳我的信仰嗎？那末，我們欲達此種目的，應該做些什麼呢？

首先，公教出版家，要把全國的書籍販賣業，認作第一個主要的對手。必須細心調查各大都市各小城鎮，所有的大小書店。然後向每家寄一份出版目錄或一部份對他們有用的摘要書目。遇機會並可派遣推銷員親往一一訪問，說明公教書的價值，徵求他們的意見。凡是新出書的宣傳品，應儘先寄給這些書店。

以上這種種方法或想出的其他辦法，都是絕對必要的。但還是不夠。嘗考一般書店，不肯經銷公教書籍的主要原因，還是爲了這宗買賣沒有利潤。書店老闆是商人，他的目的是賺錢。

只要一本書能讓他獲利，他就樂於經售。那末，他們經售別家的書，可以有兩成至四成的回扣，而公教書却是不折不扣。自然就不高興代我們推銷了，這是很近乎情理的。

同時，照目前通例，公教出版機關，又無法給他們扣頭。因為未末做會虧本的。有道是餘本不是生意經。原來公教出版家的一貫方針，是定價低廉，應到和成本幾乎相近的地步，爲的是可以普及大眾。這只能算是做好事，談不到營業。這意思未嘗不好，首先受惠的，便是我們自己人。然而事實上，要推銷書籍，決不能採用這樣政策。

假如各公教出版家能共同議定，把各家價碼增一些，能讓經售的書店得到些利潤，自然便能到處見到公教出版物的蹤跡。好像東安市場等處能看到苦像念珠聖像一樣。那麼，公教出版品也能成了一種受歡迎的貨色，因爲經售人推銷得越多越有好處。

譬如公教出版家仍想幫助傳教士善舉的話，那也很好，只須對於各教區的定貨，給予九扣或八扣的優待，或對大批定貨酌示優異，就行了。這樣便是對天主廟的一種鼓勵，對各教區整購的人一種體貼。事實上，無論中外，任何出版家，對於大批定貨，照例都有折扣。就比國說，公教出版家對於神職界，都另定優待折扣。倘能如此，我們的書便能到處風行；公教出版機關的利益，連傳教士自身的利益都可以保全；而公教出版界在一般書業市場上的遜色，也可不致再見了。

此外，公教出版品的外表，也需要隨時改良。務須避免宗教宣傳品的姿態，而以國內一般

出版家的風格爲取法。例如「道真來華」一書，是一本敘述某傳教士歷險東來的小說，頗受教外的歡迎。內蒙一帶的小公務員很愛看它。看完之後，不禁對傳教士的熱情毅力，表示欽佩。那末，這本書算得過一種良好的宣傳品，和切實的護教書了。然而可惜外表的設計，較差了些；一望而知是一種宗教宣傳的東西，使教外智識界人懶得去翻閱。原來封面上劈頭便印着某主教准予字樣，又大書特書「天主降生」云云的出版年月，以上兩項，已佔去了一半地位。並且註明是天主堂出版。至於著者姓名，却再也找不到。像這樣說相的一本書。普通外教人乍見之下，定會覺得奇怪。

個人認爲公教書的封面，最好祇印上一個書名和一個著者姓名。假使著者是一位神父的話連司鐸二字，也不必加上。至多在書末版權內注明就穀了。近來國內出版界通例，所有著者，出版者，印刷者，出版處和年月等，關乎本書的事項，每一古銅兒印在這末頁上。所以不妨將主教准予的聲明也移到這版權頁上。一本書的外表對它的銷路很有關係。所以必須悉心設計，讓它入時，順眼，尤其是預備給教外人看的東西。

公教新書出版時，不但要對教內報紙刊物，分寄樣本，請求介紹，連其僱贊反教和外教的刊物報紙，也是照例送送一部。倘若他們收到後不肯介紹，可以托人用各該出版機關的名義去當面交涉。如果托人得當，必能如願。

還有其他種種宣傳方法，個人認爲值得採用的。譬如某書出版後，預料教外某人某人，也

許高興看它的話，不妨寄給他們一張預告。這樣不但對某書是一種良好廣告，同時對公教文化，也是一種宣傳。因為在這種傳單上，不但可以推薦某書，並且可以簡明地提出書中要點。這於公教思想的傳播上，至為有效力的。

公教各出版機關，或出版事業中樞機關，最好備一份全國機關團體及私人的通訊名錄，分別註明某類書合於某機關或某個人之用。這和通信處，可以從各種年鑑，綜覽，行名簿裏去摘抄。主要的是醫師，教授，公務員，按受，著作家，報界，文化團體，學校，圖書館，學術機關，誓反教佈道人員等。順便值得一提的是，在英國方面，誓反教徒往往是公教書局或聖物店的大部主顧。

爲使公教書更爲廣銷，更能普及教外起見，若能把它交給教外出版家去出版，尤爲得計。它們有着強力的推廣方法，能達到我們所難達到的角落。所以在香港方面的 R. P. M. A. S. 曾以公教真理學會的名義，和商務印書館簽定了一種合同，將若干種現代公教名著的中譯本，由該館印刷發行。據說內容包括歷史，傳記，社會學，哲學等原著，各國語文都有。在預告中的有 W. T. Wash 的 *Isabelle d'Espagne: Pétitot* 的 *Une renaissance spirituelle*; H. Delloc 的 *L'Etat servile*; Carrel 的 *L'homme, cet inconnu* 等。由若干公教譯述人分別執筆。

此外，在各大都市必須開設公教書店一處，代辦全國各出版家所出各書，尤以公教爲重。這樣一般人購書，可以便利的多。不必再向每家分頭零購。現在香港公教真理學會已着手試驗

。天津上海方面，有耶穌會某神父創的東方學藝社，編有「東亞文獻聯合書目」。北平方面也有人提倡辦出版社，代售書報。以上種種嘗試的最後成就，或許就能開設正式的公教書局，經售全國公教出版品，和選售若干種繁銷的外版書。

第四章 社交關係

印刷物，書籍或新聞紙，宣揚教義的方法，雖屬重要，雖可有效，但若無教外教內私人間的感情聯絡，爲之準備，爲之支援，爲之完成；則其結果大抵難如預期，印刷品是個冷靜，木僵，無個性的東西，不能隨着讀者的心境與反應，去變更自己的行動。至於人與人之間，朋友與朋友之間，則可隨着對方的印象，去相機適應，節節前進或靜以待變，還有一層，書籍之引人注意，往往也是因了友朋間的談論介紹。

我們要勸化人，則私人情誼必不可少。這是天下通行的道理，尤其在中國這社會裏，無處不公私生活都以人情爲重，所以更關重要。

我們公教人如果想參加中國的新發展，要把它領上向基督去的路，要往中國文化裏探尋福音的酵母。那末，我們就只有把自己滲進中國社會裏去。我們要過着國民生活，要和中國人民各階級層，尤其是智識階級，儘量保持着最頻繁，最持續的友誼往來。

福音是酵母。要發起酵來，必得把酵母和它密切的滲和，使它完全透進麪內。否則，酵母雖已滲入麪內，而局處一隅，不與它密切接觸，任使質地如何良好，也難對它發生作用，讓它發起來。公教在中國但是如此。任令神職界以及信友們如何熱心，內修生活如何緊張，倘若敢

步自封，離羣索居，在國家大集團裏自闢一個樊籬，那末他們的社會作用，會等於零吧。但是倘能一方面精勤內修，一方面跳出本身以外，混入其他同胞中間，參與他們的公衆生活和一切全國性的文化活動，社會活動，則他們的勢力，不會不逐漸深入，逐漸將全國領向基督。

可是，在過去，我們慣常做些什麼呢？我們只在自己人間生活着，閉關自守，與外界公共生活絕緣。大多數傳教士對於新生的中國，常懷着一種戒懼之心，置身局外，不注意它的發展。

這種戒心，這種孤立的原因，當然一部份爲了教會住所距離大都市太遠，對於國內優秀份子的深遠思潮，過於隔絕。我們往往把這些優秀份子，認爲和身旁的貪污份子是一丘之貉。我們在歷次政變和社會動亂中，吃盡苦頭，却未曾覺察到中國已有一種新的精神，受了崇高理想的啓示，而終於萌芽。

其次，在我們與執政者和智識份子的接觸中，時常受一種怯生情緒的窒礙。這一種怯懼之情，在外國傳教士方面，是因了他們未能深通中國語言和繁瑣的社交儀節。在教友和中國司鐸方面則因了所受教育之不同，和長期的斷絕接觸，因而坐失了若干向外發展的良機。全是這種怯生的情緒在作怪。

在我試讀着幾個現代中國作家的作品時，往往自發奇想：「這些對中國發生了偌大影響的人們，他們對於公教，對於司鐸信友們，會發生過什麼樣的關係呢？在目前領導中國的人物中

，亦即一般統治者和智識界領袖中，會有幾人與公教司鐸，和有勢力的信友們發生過關係，交換過意見呢？」

自然很少！可是假使我們能和他們相識相見博得他們的同情，信任，與友誼，和他們時常親切地交換意見的話，那應該如何地好辦事呢！他們在尋求着新的方案，我們要如何對他們的研求與努力，表示關心。由這些私人關係我們對他們可以發生如何的影響，再由他們，又可以對全國發生如何的影響呢！

在西洋傳教士初入中國時期，他們因為，「朝裏有人，」所以能發生了若干良好影響，至今猶令人健羨。現在領導全國向新命運前進的有力者，已不是專制帝王，也不是政府的幾個要人，而寧可說是那些智識界的領袖人物，那些哲學家教育家和社會思想家之流了。

我們要使中國歸向基督嗎？那末，多多去接近這個智識階級，注意他們的事工，獲得他們的信仰和同情就行了。

有人說：「這話很對，可是這類私人關係，不是那末容易結成的。第一，先得有機緣；第二，還得他們有反應。」我說：「不錯，可是我們不妨盡其在我，去發展這些關係。機會到來時不可錯過。反之，要設法尋求機會，急切的抓住它，設法利用它。對於青年傳教士以及信友們，要往這方面鼓勵他們。」

想結成這類私人關係，必須避免那種意氣凌人的態度，最忌那種說教的口吻。進身之際，

要態度謙和，表示對於他們的著作或事業感覺興趣，對他們的才能感覺欣羨，而自己極想向他們虛心請教的樣子。任何著作家，任何文人，任何事業家，對自己所引起的共鳴，對自己的思想著作事業所換來的關切，沒有不感到欣慰和得意的。

那末我們就由這個門徑去接近他們吧。例如我們可以對某作家作一篇評介。這就是一個接近他的機會。還可以請求將他的某作品譯成西文，或將其全部著作，作一介紹，讓歐美人士，對他有相當認識。並可藉此機會，質詢他的某一種有價值的思想或發明請他補充說明。這樣一兜一搭地沒有個達不到交換意思的目的。可是在進行中不可性急。務必要有分寸，有眼色，剛復的用強人就己的態度尤當力避。

中國人對於意氣飛揚傲慢自大的外國人，下意識地有一種反感，這原是很近情理的。可是，若用客氣禮貌去接近他們，大致都樂於周旋的。

另有一種私人聯絡的方法，就是向他們請求協助，尤其是當我們有理由相信他們定會樂於幫忙的時候。這正是合適的機會。因為這類請求，最能投合他們的自尊心，最能給他們面子。這一類幫忙，可以是某種學術上的就正，或刊物上的徵文，或慈善事業上的合作。

我們要會借助於最適當的中間人，請他替我們介紹，替我們約期會晤，或代達請求書。聯絡的成功與否，往往與介紹人的選擇是否適當，大有關係。

對於一切學術機關，文化機關，慈善機關，教育機關，橡華洋義賑會，農民合作社，平民

教育，防疫會，拒毒會等請求合作時，除非另有重大原因，務必盡力去協助。在這類組織裏，我們往往能結成很和諧很有用的友誼。當然這一類的友誼，也不能漫無別擇，可是原則上可以說，凡這類有益的善舉，不分官辦民辦，都應該隨時參加。

與智識階級間私人聯絡的好處，是多方面的，顯而易見的。首先可以幫助我們教人認識聖教會及其工作事業與使命。同時也可令人聯想，教會中人既然都有相當學識，對各種問題都有高明的見解，對於民衆福利國家繁榮又肯道樣熱心奔走；自然而然，對於教會本身也有一番敬重心，再由敬重生出好感來。我們再設法用我們的知識，急公，謹慎，謙抑去博取此種好感，讓它透過我們本身，落到整個體制上，落到我們所負的使命上。

一個對教會及其信徒和事業有敬重心有好感的人，這個人已經準備成熟，可以接受信德的恩惠。甚至即使還不到那宗程度，至少他對於公教教義的偉大崇高，也不能不油然而化，因而在他自己智識生活的發展上，有所補益。然後再出他的行動，影響到其他智識份子，而漸及於羣衆。

這種感召力的發揮，甚至連我們自己也無從體驗，甚途無須我們的直接行動，也能由我們的友誼中，由彼此感情的交流上，自然發出。可是這種由於我們對人表示好感而換來的好感，可以允許我們有機會採取比較直接的行動，例如交換意見，討論思想，徵求或供給參考資料，借貸書籍等等。諸如人生的終向，宗教的需要，永生的渴慕人類幸福的追求，紀律威權的必要

性等，或類乎此的問題，一旦由他們或由我們提起，便隱然有了散播真理種籽的機緣，日後可望結成碩化之果。

這類的歸化。越多越可喜，那是自然。但是我們不能單憑歸化人數的多寡來判定我們與教外私人間聯絡的成果。在文化傳教事業裏，無論是藉私人聯絡或藉言論機關，或其他任何方法，主要之點，不在其某個別特殊成果的獲得，而是整個社團的向上發展，是公教教義的滲入全國人思想，是全國的走向基督，庶幾在或遠或近的將來，整個國族，或至少整個國族中的大多數，可以預備成熟，終於自獻於基督。

在此最高夢想未實現以前，我們所結識的朋友，已可替我們自己，替我們所致力的事業作種種的幫忙。你認識的朋友，是報社主筆，社長或編輯嗎？他們會大開方便之門，接受你的參考資料或專論，上述與教外刊物的合作，就可得到很多便利。他們能在各出版公司裏說進去話嗎？那麼上述的好書編譯運動便可受益不淺。他們在法令起草方面或各級行政機關有發言權嗎？那便能在多種危機與暗中維護，替我們的各種事業作有利的斡旋。有了他們的幫忙，可以使我們在贊助官方各種福利事業，教育事業，農村事業，社會專業時，得到賞識與下次的約請。諸如此類，很容易列舉下去。

以上種種重大利益，自然不能僅靠私人關係。此外如公教機關與教外機關間的文化合作，也是增進感情的一種方法。

第五章 文化合作

中國與西洋各國文化的交流，是中國人方面，自發的希冀與主張。過去「中山文化教育館」的創立，便是一部份爲了這個。「天下月刊」的創辦，也是此種用意。該刊的宗旨，就是對西方解釋中國，也對中國解釋西方。這類文化交流運動，很受政府當局的期許。像孫哲生先生，在天下月刊創刊辭裏會說：「從來文化與文化的接觸，沒有不發生良好效果的。我們所應做的，便是這方面的國際關係日趨強化，文化事業的涵義之一，便是思想交換。惟有文化是無國界的。並且它所供出與它所吸取的，能等量地充實自己。任何民族都可以參加……所以我們要竭盡力量來實現「國際聯盟」的這種計劃——文化合作」。

爲了同一原因，在中華文化基金會裏，設有一個譯本審查的小組織，據說二十九年一月間會着手情人翻譯費頓之的「入華耶穌會士列傳」和古朗士的「希臘羅馬古代社會研究」。此外還有其他譯本八十餘種預備出版。

中國方面注意東西文化交流的另一表現，便是派遣學者出國講學。例如胡適之先生的游美講演集業已發表，名曰「中國的復興」。又會約請外國學者來華講學。過去如羅素杜威諸人的來華，乃是由於前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先生的邀請。

這文化交流運動的主旨，就是促進東西文化，使雙方更深切地認識對方的一切制度哲理信仰等。中國學者，對於東西文化與其相互影響的比較研究具有非常濃厚的興趣。要明瞭此種趨勢，祇須看一看近年的天下月刊中所發表的論文和書評，便可明瞭。所以若有傳教士關心這些問題，那是很可喜的現象。這是對中國智識界發生作用博取好感的良好場地。（註十一）

另一方面，可以使西方社團與中國同類社團發生聯繫的，就是「學術合作」任何高等學府，任何學術研究機關，都注意國際聯絡。爲此過去的國際聯盟曾創設「世界文化合作協會」，以便利各國間學術文化事業的切磋。其具體表現便是大學教席交換制，優秀學生獎學金，游歷金，交換出版品，召開世界學術年會等等。依這類中外學者間的聯絡，在國內或國外共同合作，對同類專門問題的關心，同一問題的共同研究，同一工作的共同從事等，都是極好彼此接近的機會，其結果決不會不好。

這類文化方面學術方面的聯絡，主要應負其責的，還是中國各公教學術機關，像大學校，博物館，天文台，地質生物研究所等，以及各該機關的專門刊物，還有在華的專門學術家，從事中國文化，科學，史學，語文，或其他研究者，也應負起這責任。但是這也應該是歐美公教各同類機關的責任，他們對於公教文化與東方文化的接近工作上也有其應盡的很重要的任務。在國際學術界越受重視，越有地位的人，越能作有效的行動。

或許這些大學中，偶有不大明瞭自身可能相當的任務的，我們爲傳教士者應該去轉告，促

勸它的。它們中間有的已十分樂意加入此項運動，并且引以爲榮。

魯文大學校長 Mr. Jacobs 當一九二九年八月廿七日第七屆傳教學術週假該校舉行時，在開會詞中說過：「大學教育問題，和傳教問題，並非是兩不相涉的。我們在這裏聚首，是有意義，有莫大的意義的」接着舉了幾種各大學應與傳教區合作的例子以後，結語說：「我的意思，只是要證明一件事：大學與傳教事業有着連帶關係。這兩項好像一種合璧式的瓶蓋，彼此貫通。所以這種聲氣的應求，這種交換的幫忙，最好能再加頻繁。我的起立發言，不過是表示這種希望而已。」

那末，除了魯文大學以外，其他各國公教高等學府大概也是如此。大家都樂得參加國際文化學術合作運動，以爲傳教事業的助力。我們身在中國的傳教士理應對此問題加以縝密研討，然後向他們提出具體的建議。

個人私見以爲凡遇有中國重要人物到歐美游歷時，應由各該公教大學約請他們舉行講演，說明中國現狀，最近思潮與社會制度，和其他成爲問題的問題。就魯文一地說，我想可以招到很多的聽衆。

到現在爲止，這些游歷歐洲的人物，所接觸到的往往是唯理主義，唯物主義或反基督主義的人物。就法國方面說，他們自然會走到像「華法教育會」一類機關去。華法教育會乃蔡子民氏所創辦，目的是要中國學生大批地赴法留學。當時的主張是：「往歐洲各國留學以法國爲最合

適。唯有法國能擺脫宗教思想的束縛，給予青年人一種真正合理化，真正科學化的教育。唯有法國可以告訴中國需要何等的社會革命，方能走向復興之路」。當時副會長是孟台氏，他是里昂區共產黨議員也是人權同盟。（一個反公教組織）的要角。此後每遇中國要人往法國或其他各國去游歷時，總是具有同類思想的人物担任招待，負責指示所謂西洋文明的真面目。

假如西洋各國的公教文化學術機關，與中國同類的機關，素有聯絡，而由它們去招待這些人物，給他們看看公教對西方文明有如何深刻良好的影響，那末中國公教會的聲價和公教思想的傳播定可獲益匪淺。

爲使此種文化關係更形深遠，希望歐美各國的公教大學，能够開辦中國學系或東方學系。在它們的出版品或刊物中闡出較多的篇幅來容納東方學的稿件。並能對於遣派留學的中國學生熱誠款待。特別關切。

中外各公教學府，對文化合作運動，固有極大的助力，可是普通傳教士連鄉下神父，也可以，也確曾致力於國際文化聯絡。歐美捐款的善士們所知的教務情況，全靠他們的傳聞。甚至關於中國大事，中國的文化，中國人生活的常識，也都憑他們的報告。直到現在歐洲有很多地方，對於中國的一切，全是得諸教士之口。他們對於中國國家的態度，對於中國社會制度與發展的意見，往往是看過傳教士通訊以後的反應。

同時，中國有識之士，一件特別關心的事，就是歐美各國人士，對於中國的觀感；他們自

已對於歐美各國和西方公教文明的態度，恆以此項觀感爲準。越是他們感覺西洋的公教徒，對他們本人，他們本國表示欽佩，關切與好感，他們本人也對公教及公教信仰越感覺欽佩同情與景慕。反之，倘若他們所遇到的，沒什麼好感，只是些疑忌的，鄙視的憐憫，那他們自然也立起反應，永不肯接近公教人了。

然而，外國傳教士，在他們的書翰和通訊裏，很容易對他們傳教時的障礙，對於所遭遇的異樣成見，對妨害自身事業的一般欺騙行爲，社會病態和政局動亂，形容過甚。無論他們如何愛慕中國，對中國人民如何忠誠，親近，同情，可是他們的敘述給予一般不明真相的西方人士的印象未必總是良好的，因而對有助傳教事業的國際親善，有了妨害的危險。

所以外籍傳教士應自慮自戒，極力避免一切能以刺激愛國情緒的言論，那不特替我們自身和我們的事業，並替整個教會和福音招來了麻煩，杜絕了中國重要人物的敬重與好感。在我們的言談文字裏，要時時表現一種基於中國之愛和切願中國歸主之心的寬大諒解。況且，公教仁愛精神，也要求我們如此去做。

尤其關於中國革命，我們要表現一種開明而同情的遠大眼光。對於中國改革家的努力革除陋習，肅清積弊，努力使中國走上進步之路，及其所懷之光明正大的愛國情緒，只有贊許的份兒。激勵他們的，不是別的，只是祖國之愛，和願祖國强大昌盛起來的熱情。他們在此番事業上費盡了他們的光陰，心血，與才智。不少的人甚至因此犧牲了他們生命。他們的領袖在臨終

之前，所留遺旨，還是念茲在茲地，要努力奮圖救中國。

假如在他們的醉心改造中，有少數人們或失之過激流於暴動。那大部份的責任，應由歐洲方面發縱指使的人們去負。況且全國上下對此早已起了反應，防共運動的堅強，令人驚異。

在革命過程中，雖有若干不逞之徒，乘機混入。可是忠實的革命者，已首先自動下手，大張撻伐。如果說這些革命志士自身，也未必一向走着正路，可是反過來說，像我們這班人，對他們毫無指引匡扶的，還配去吹毛求疵嗎？

況且，在他們的全盤計劃中，很有幾點，值得我們去贊助。例如吃人禮教和專制勢力的擺脫，懲治貪污，根絕以內戰稱國的軍閥，改善勞動者尤其是農民的生活，折讓家長對子女濫用權力，無理壓迫，不顧子女最正當權利，任意處理其終身，提高女權，提倡國家教育，民衆教育，採用白話爲國語等等，還有很多別的工作，都值得我們同情，贊助與合作。

定要對大體的中國革命運動取一種疑忌敵視的態度，那是自絕於青年中國，自限其感召力的頂妙方法。（註十二）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重大，值得十分注意的問題。

在文化合運動中應具何種精神，孫哲生氏在上述論文中說得很好：

「今日世人，專愛用放大鏡去觀察別國的缺點。這種傾向，較之用寬厚眼光觀察國際關係的傾向尤爲普遍，在中國英國或其他國家中，有很多新聞記者和政論家，專以挑剔其他國家的毛病爲事。我們是極力反對這種做法的。我們相信大家若能時時留意我們自身與別人共有的優

點，定會比專門留意彼此相異之點，可以有更多的好處。這不是一件容易事。我們先要正心誠意地發動國與國間的友好合作。同時要造成一種親善的氣氛，在這氛圍裏，所有實際接觸的結果，不是彼此刺激，而是開誠相與」（見天下月刊一九三五年頁四）。

想對新中國發生影響，想誘導它到基督去，想以福音真諦滲透它，我們應懷着一腔同情去找它，要設法瞭解它，從中國文化裏探求它所具有的一切優點。

中國是一個自尊的國家。它對自己，有着很深的自信。它要外人以敬重優禮待它。這不是很自然的嗎？必如此，它才肯與外人開誠合作。現在引證蔣宋美齡女士一段話，很有意思，很足尋味。她說：「中國民族過去一向有他的特殊精神，日後將來也只有它自己的看法。它只能和那些能瞭解其特色文化，正義思想，自由愛尚的人，才能合作。中國社會本身內，自有其新生的原素，但它需要一種嚮導和一種「更深的信仰」（見公教教務叢刊一九四一年，頁二九

O. R. P. Monstaerleest 所引）

（註十一）關於這方面，耶穌會裴化行神父，以其潤博著作，佔上了相當地位。

（註十二）一件至足遺憾的事：耶穌會戴神父 R. P. Wiegner 的著作，雖然很有價值，但

處處流露着對中國一切那變不同情。他那宗悲觀譏嘲的口氣，即使頂「不在乎」的中國人，也往往發生劇烈反感。那是很自然的。尤其可惜的，是有些教外學者還認爲那些著作，代表着一般外國傳教士的共同見解。

反過來說，假如當初這些書屬稿時，都抱着寬厚的諒解與同情，那又是如何得力的說教工具，如何良好的文化媒介。

所以希望這些書再版時凡遇觸犯中國人的地方，都把它刪掉才好。

第六章 講演

在文字傳教方法亦即用報紙，或其他出版物傳教方法以及藉私人聯絡發生作用的傳教方法以外，還有富衆講演的口頭傳教方法。對教外人直接說教，也是一種文化工作的形態，對於祛除民衆隔閡，灌輸公教思想使人敬重聖教上，都能有極大的幫助。

這個問題需要在這裏加以檢討。但因限於篇幅，並且他人在別處已經說得很透澈，不必再多煩絮，所以我祇介紹諸讀者去參看雷神父 R. P. de Tereah 那篇很有意思的論文（載公教教務叢刊，一九四三年頁六三一至六四五）和和神父 R. P. Henrijers C. M. 述「永平府安神父 R. P. Dekkers C. M. 之傳教事蹟」的那篇動人文章。D 神父在駐華多年後，五十歲上，才開始實驗他這種傳教方法。他熱烈而謹慎的用盡全力試行了十五年之久，結果異常圓滿（註十三）。

依我的看法，他這樣工作的成效，還不盡在付洗成人的與日俱增（十五年中六百人），雖然這成績本身已極可觀，主要還是公教思想，在一個地區的得能散佈。現在那裏的人已認清公教會的使命與其教理精髓。所以必須鼓勵中外傳教士去克服他們的怯懦，果敢地從事這種講演工作。

這種形式的傳教方法，對於不識字的人和一般民衆，特別適用。至於間或觸及智識份子，那祇是偶然的事。關於後者，可以在重要都市裏舉行對智識界的講演會，散佈健全思想，向他們介紹現代問題的公教解答。

這類工作的成功與否，尤其在於籌備的是否得法。倘若組織方面準備方面，不能得心應手，其失敗幾乎是必然的。所以我得說得詳細些。

我認爲在任何都市，都得先成立一種講演委員會，以教內教外有地位的人物去組成它。目的是引起當地智識份子，對各大文化問題的注意。

我這種主張的來源，是受了歐洲方面業經實行過的方法的暗示。尤其在比國首都布魯塞耳舉行的「樞機邁西愛紀念演講會」其主辦委員俱是政府要員和文藝界法律界教育界的名宿。執行委員會每年排出二十餘次的講演節目（每月兩次）講題都是能夠引起一般智識階級的興趣的問題。主講者，俱是社會上很有名望的人，從比國各地，或法國以及其他各國請去的著名學者，各人講一個選定的題目。每遇這類講演，總是座無餘地。聽衆也都是一時之彥。講稿每由報紙轉載。我們爲什麼不能在中國也舉行這類盛會呢？

自然，假使對外標明了這是宗教宣傳性質，則主辦委員會中難以拉進各界有力人物，大致也難以號召多數特選的聽衆。

所以在預告裏，得把它宣講得好像普通性質的學術講演。可是暗含着對每個問題之正確觀

全的公教精神的解決方式，要順便指出。

問題在於善擇題材與題目，例如：中國大家庭制度，新婦女運動，婚姻問題，納妾問題，離婚問題，家與國之關係，兒童保障問題等。另一方面問題如：西方文化對東方之貢獻，東方各國對於西方哲學的影響，十七世紀時中國文化西漸等，在這些問題裏，都可以藉機會散佈本乎公教原則的健全思想，使其對於領導現代中國的發展上有所助益。此外不妨偶爾討論到比較純粹的宗教問題，例如：教廷與現世界，科學與宗教，人生與信仰之必需等。

要想召集很多的聽衆，這類演講會必須有完善的宣傳爲之準備，必得由報紙預先通告，繪製美術廣告，大量地張貼在重要的地方。對社會知名之士，要特發請柬，他們決定參加時，要預先宣布。新聞界人，也要特請其參加，並爲他們特設專席。

入場券的銷售事務，務要縝密組織。可以先派青年們，少女們，上門推銷。把全市分爲若干區，每區應兜銷的人家，斟酌列單。又舊時的學款淨數，可以聲明充作某種善舉，那就更容易銷售。市內大商店也可略托其代售。

至於會場，可以選擇一個全市著名的地點。可能的話，找一個富麗大方的演講廳，或者借用一個大學的禮堂，一家戲館或電影院等。

秩序的維持，要有妥人，如大學生之類的，去負責讓他們客氣殷勤地領導來賓入座。

以上雖屬小節，却於成功上，有極大關係。但另有一件尤其重要的事，就是主講者人選問

題。假使請的是個孺生的人，不管他多麼內行，多麼有學識，怕只能招來寥寥可數的幾個聽衆。所以尤其在創始之際，要約定幾位鼎鼎大名的人物。這自然很費力，可也並非絕難辦到。現在的公教徒中就有幾位。

但是，當然也得另請幾位教外的。譬如看見某人作的書，寫的文章，對某問題具有健全思想，雖然他不信教，也不妨請他作一次關於這問題的講演。這爲一般聽衆固有益處，即其本人因與公教團體發生關係，也是有益的事。

一位主講者，在某城市作過一次受歡迎的講演後，不妨約他再到別處去重講一次。這樣便能約定若干學者，作巡迴式的講演。

這類的講演，除去當時散播思想以外，還能給予公教報紙以藉題發揮的機會，使其影響更形擴大。被邀列席的記者，在散場後，可以索取講稿撮要。這樣，不但翌日的記事容易著筆，並可連帶發表聽後的感想。

因爲事實上，演講會由公教人主辦，而對象却是非公教徒，這就足以促進上述的私人聯絡與文化交流，並能擴張教會的聲勢。

(註十三) 該文後發表於，一九四三年頁五五七北平教務月刊。

第七章 全國大會

欲使口頭宣傳得到更大的回響，使其深入各階層，尤其統治階層，沒比召開全國大會更好的法子。要明白這個，祇須回憶民國二十四年九月十五日，在上海由蔡主教主持下，召集的「公教進行會全國代表大會」就行了。

雖然列席該會的非公教徒人數不多，可是每天議程中的主要事項，都有龍光社的特稿發送市內中西各報，第二天全在專欄內登載出來。這些稿件因係出自神職界手筆，字裏行間，便能吸住教外讀者的注目，藉得明瞭教會精義與事工。

結果開會的一週間，全滬看報的人逐日得知公教會在華根深蒂固的地位，竟有力在上海召開全國各省代表大會。很多教外人，以前不知公教之所以為公教的，在報紙上難得看到人提它或僅會看到它受人攻擊的，現在明白了這乃是西方多數國家所崇奉的宗教，它曾主動了西洋文明的發展，並能令世界各國以及中國人民與政府加以尊重。

政府代表的親臨與會，也頗能與人以深刻印象。上海市長吳鐵城，財政部長孔祥熙，不但到會列席，並且即席致詞，對教宗與公教會盛加稱譽。行政院參事彭學沛奉命代表國府林主席，在會場宣讀主席祝詞。國府五院中有三院院長和新生活運動總會會長向大會拍發賀電。

藉此大會的機會，政府的最高當局，不但明白了公教事業的發達，公教會的未來工作計劃，並終於公開表示其關切予以獎勵，在某種意義內予以贊助。本來我們公教會在中國的法律地位，諸如公教傳教權，置產權以及興辦教育事業，社會事業，慈善事業等權全靠這些人物來決定，而涉及公教事業的法令其實施的權衡，也全操諸這些官吏的手裏。

藉此次大會公教遂能公然顯示其活力，引起全國的注意，並表現其參加全民活動展開社會工作的決意。對於自身種種事業要求自由發展的法益。同時並有若干提案檢討到信仰自由與憲法條文，教會財產權，公教新聞事業與社會福利事業等。

此番經驗確是一大成功。因而可以說，全國公教代表大會是一種良好方法，使全國人民明瞭公教會的存在及其宗旨，本質與性格。務讓全國民衆瞭解公教的重要性，它所舉辦各種事業的性質與關係，與其對整個民族的貢獻，真沒有比這更好的方法了。藉這類大會爲媒介，我們定能使全國人曉得公教會對於國民的信仰，道德，社會，家庭各方面的生活，所能提出的解決方式。

全國大會，好像一種高台，一種揚聲器，藉它可使朝野上下都可以聽到我們的呼聲。關於這個，只要我們的通訊機關組織完備，把擬就的紀事稿不但發送給大會所在地的本市各報社，並轉發到國營通訊社，以及一切國際通訊社。

有了全國大會我們才能出離我們的株守，衝破我們的埋沒。藉機會與有力人物，公私社團

開始聯絡，以便日後共同活動，共同工作。至於信友方面，尤其有志文化工作者，還又是一個超好體驗個人能力，蓄勢作傳教活動的機會。

況且我們的公開行動，如：全代大會，參加遊行，儀仗出巡，青年節，學校慶祝會等，都足以表現我們的活潑信仰。永無嫌多嫌勤之理。我們已不是當年地下活動的時代了，爲公教徒者理應逐漸多多參加公共生活。西洋方面，也正是向這一面行進。青年組織如：Y. B. C. 公教學生會 Y. O. C. 公教青年勞工會 Y. T. C. 公教青年農民會，公教童子軍等；社會組織如：各同業公會，公教農協，公教職協，以及公教進行會各專部，各種學術團體年會等都非常活躍，一方面是爲向全國發展勢力，一方面也爲保持會員們的興致，鍛鍊他們的意志。

上海全代大會之後到今天已過了十個年頭。將來和平恢復後，似乎還得再召集一個第二屆全國代表大會，就事實而言，上海一埠確是召集全國大會最適宜的地方。南京固然是首都，但該市內公教機關實在太少，又不甚發達，決沒有招待如許赴會者的力量。同時上海因其各方面的重要性，可以算華中最合理想的中心。但爲把大會的利益，擴展到全國，最好在召開之前，先在各地召集預備會。譬如說，以每一傳教區爲一單位，這種分區預備會作爲第一年的工作。第二年上半年，分別在北平召開華北全區大會，在廣州或香港召開華南全區大會。到第三年上半年，在上海召開全國大會，集合南北代表於一堂，將三年內的工作，作一總結，成一個大團圓的場面。

這樣一來，所有的公教事業，都可以受到推動，全國各地都可以被觸及，以累進向上的動作而抵於上海全國大會的完成。分區預備會是全區大會的準備；前者的決議與動議又可在後者加以修訂與表決。

第一次大會的主題是「公教進行」。下次大會的主題似可定為「公教社會事業」。這題目也是非常廣泛的。很願將我們大多數的工事容納進去，並且另有一種好處，就是更能適應現時中國的需要，更能夠一般人所瞭解，此外還能藉此申明公教的社會學說，證明它如何地適合國內現狀。

自目前起，就該組織籌備會去研究以何種方法，可以收到最完美的效果。第一先得確定我們所預期的是何種結果，不僅要顧到我們的內部組織方面，連關於政府當局方面的也要想到。既是一個全國大會就有向政府提出建議的資格。那末，我們要好好討論，對於信仰方面，教育方面，家庭方面的立法原則，都應作何種建議，又當用何種方法，可使這些建議為政府所嘉納，逐漸見諸實行。

全國大會可以給我們一個機會，去仔細研究中國現在的各種社會問題，更仔細確定我們解決這些問題的原則。並為發展各種事業，為與政府機關合作，為在全國的社會動向上發生更大的影響，而從各種合用的方法中，選出幾個最好的。

第八章 教育事業

第一節 學校在文化事業的功用

我們想要致力中國歸化，對其未來動向發出深刻的影響，必須多辦各級學校。這教育事業與國家前途的影響，過於顯著，無須證明。

此次戰後，我們當然得努力發展公教教育。不過，要使它發揮真正效用，不但要盡力多辦學校，以量取勝，還要注意其素質。倘能把我們的學校辦得非常完善，使它所授的課程，所施的訓育，合乎水準，甚且超過他處的教學與訓導，則其成功是可操左券的。

公教學校的普設，教導的良好，所享的盛名，這一些祇是先決條件。要判定我們教育事業的效率，還得看公教各院校對中國歸化大目標的貢獻如何。假使它們能够把公教哲理的原素，滲進中國社會，能够把聖經的原則，透進一般人的理智裏，心靈裏，那它們的目的才算達到。否則，就算失去了它們的終向，不管學生人數如何之多，學校名氣如何之大，我們辦學的努力算白費了。

這個話說得更真切些，就是不能讓教外青年受過公教學校教育以後，除在外間學校一樣能得到的東西以外，別無所得。假使他們在我們學校裏念過書以後，眼在別處念過書以後，完全

一樣，一點兒什麼也多帶不了走，那他們與公教機關接觸一場，究竟得到些什麼好處呢？還是讓他們到別家學校念去，不是一樣嗎？我們還能省下不少人力，精神和財力（註十四）我們不惜犧牲那麼多的時間，精力，金錢去辦學，自然是想藉這些學校的力量，不但授與學生們一般的良好學識，還要讓教外生在內，讓他們得到公教式調育的各種優點。

這些優點是什麼呢？總得把它弄清楚，因為我們辦的教育事業，要它真正發生效力，全靠這些優點來衡量。

先就消極方面說吧。公教學校的目的之一是「防護」，就是讓青年們不受外單的不良薰染。教育可以陶成兒童或青年的理智，灌輸以人生觀的思想和羣生遵為準繩的原則。譬如宇宙原始，人類原始，二者的終向，人生的意義，青年對於自身與家庭，社會間，對於宗教，迷信等關係，以及對於科學與宗教之關係，應知的原則等，這些都是些極重要的問題。還有很多別的問題必須用教育去啓示青年，而訓練其正確思想的。

隨教育方式之互異，使其終身有對於宇宙觀和人生觀也可有不同的定型。倘使由着思想誤謬的教師去給他說明，則這些問題對於青年人可以發生衆所週知的悲慘影響。

新近有一位公教高等教育機關的教育家，告訴我該校入學的青年，大多數如何充滿唯理思想，如何堅信宗教與科學的兩不相容。說二十世紀的有識人物，決不能再去信什麼超性世界的存在。要明瞭一般青年在公立學校裏學來的種種成見的力量與性質，祇須一看蘇梅女士在里昂

大學讀書時，預備進教以前，所遭遇的種種困難，就可以明白。那時的她，只要在樹上窺見一位神父，就由心裏起一種憎惡。因為早先教育她的人說過，宗教信仰乃是一種近於癡狂的變態心理之表現。不過因她終究要明白教中情形，她的房東太太就請了一位神學家來和她談。想起了耶穌的天主性，她說：「我聽了這種怪論以後，心裏不禁暗笑，真不懂一個二十世紀的文明人，怎麼還能說出這樣荒誕不經的話」（註十五）

所以防護青年人思想，使其不受毒害人心之謬說的薰染；不致有如此粗野的成見與公教感召力絕緣，這是公教教育的第一樁好處。不過這優點還只是消極的；必得有其他積極的長處來補其不足，那就是一個健全的訓練，使青年對宇宙和人生，得到一個純正的觀念，在公教學校裏，得讓他們認識，有一個掌管萬物用上智覆庇人類的造物主，我們應當承認他敬事他。得向他們解說靈魂的不死，良知的作用，倫理的責任，身後賞罰的必要。每人良心在他私人生活，家庭生活，社會生活裏所課予的各種責任，也得讓他們知道身體力行。（註十六）

關於目前爭辯最烈，青年最關心的問題，也要分別給他們一種明晰的觀念，例如擇業，擇偶，婚姻意義，婚姻之不可離性，家庭教育之關係與原則，關乎私產，資本，勞働與工資等之社會學要旨等是。關於虛偽的哲學理論之謬誤，要予以警告；其弱點與流毒所及，尤須特別指出。

但講授此種課程的好處，雖能使他們接近公教理想，究竟還出不了自然哲學之大旨的範圍

。除此以外，公教學校在對教外青年的感化上，還要着重一種更深遠更近於辯教性的感化。

凡從公教學校出去的青年，都得讓他們對於公教會本身，及其性質，組織，與各種體制，都有一種清楚的概念。大體上知道公教會在西方文明的發展上，在哲學，倫理，科學，技藝，文學，教育，以及社會方面，慈善公益事業方面，都有過何等貢獻。公教徒中的科學界名人，要特予指出。還有教廷的地位，公教會在現世界的勢力等，也是如此。

末了，公教各級學校應達到的一個最後目的，就是讓一般教外生，約略認識基督的生平和他的超性使命。

他們得對於三位一體，降生救贖等道理，有一種基本而正確的概念。還在他們臨終之際，倘有神父教友，能接近他們時，可以作為勸其受洗的張本。（註十七）

或許有些人，對此加以駁難說：「這未免欲望過奢吧。尤其在公教高等教育機關，青年人的成見與戒心，如此之深；一提宗教問題，馬上關起心門，第一要緊的還是得過且過不要嚇退了咱們的主顧吧。」我想這層困難，或許能設法避免。就是把上述各種要旨，向學生提出時，不要顯出努力宗教宣傳的形式，或有施用壓力迫其就我的意味；只當作普通常識，普通文化問題去闡述，就可以了。

任何學者，不拘他的思想屬於那一方面。不能對於一般宗教的實際，以及天主教教的實際等，毫無所知。何況各國通訊社，都不斷發表關於宗教，或各國公教團體，或世界各地公教動態

的消息。還有由西文譯成中文的小說，牽涉着教理或教儀的敘述，觸目皆是。身爲文化人者，對於這些事情，決不能不稍具些清楚的概念。

由這個角度去看，我們甚至在高等教育機關裏，也不妨於福音傳授上，發揮積極的作用。我們不要忘記此種作用，乃是我們努力辦學的本意。沒有它，這氣力等於白費。

或許另有人駁我說：「若祇是防止公教學校的學生受邪說之傳染，示以正確的自然哲學的解答，授以默啓的基本要旨，這目標未免定得太低了些。我們辦的學校，應該是教外生的救生港，應當讓他們能夠找到信德，獲得聖洗的恩寵。這才是我們應該對準的目標，應在辦學時以此自勉的。」

關於這個，我的答覆是：我們對於個人入教，固極表欣慰，並應予以種種便利；固應在公教生中，培養着一種勤化熱情；但同時我們也得在公教學校內，竭力避免一切純粹的宗教宣傳。在這方面，不能對學生們施以任何壓力。甚至形式上稍涉強迫之嫌的行動，也要注意避免。教外生在公教學校裏，應該覺得逍遙自在，覺出旁人尊重他們的信仰自由。否則他們會起反感，離棄公教學校，倒戈相向。甚且我們應當避免對教內生，保守生，任何優越待遇。凡請求領洗的，須是真正的信服，不該是爲討好或爲私利。因爲那樣會使教外人看不起聖教會，同時收錄的新教徒，也不會有成色呀。

此外，無論我們鑒於近年各公教學校新領洗學生人數激增，而如何高興，我仍認爲我們應

特記準：就傳教事業而言，辦學的真正目的，決不是單爲勸化多少中國人領洗入教，而是對整個中國青年層，施以真智識真道德方面的感化，再由青年界普及到全國。

一般公教教育的職責，就是領導青年思想之演進，使之接近公教思想。這個話，於大中學教育爲尤然。僅在相當範圍內，可貼着小學教育來說，因爲小學方面，原不妨較爲公開地施行公教教育思想糾正問題比較不那麼嚴重。

另一個質問，大概是：「以上教理項目，若在理、工、醫、高等實科，又將如何去講授呢？」本來，這些項目，在文、哲、法律、社會、教育等科系，以及普通中學，固可設法講授；至於其他實科，確是判然地另爲一事。

關於這個設難，我們可以有兩種答覆：第一，可以加增與學生私人間的關係去補救它。還可以在這些院系裏，成立若干研究會。除討論現代問題外，並可涉及一般文化，社會和宗教等問題。此外，用公開講演的方法，也可普及到全體學生，以至全市的智識界。

第二兩答覆就是：既然此種訓導，惟有在文、哲、和其他近似院系，才易著手；而且我們辦學的主要目標，端在於此；那末，我們何妨索性側重此種院系，設法加以擴充呢？

因此，這裏不能不稱揚天津工商學院，新近竟替該市女生，添辦了一所女子文學院，大受各家長的歡迎。上海的震旦女子文理學院，在一九四三年，已有大學生二三名，附中生五二一名，希望滬津兩大學，在此文戰後，能够再替男生們各添設文哲學院一所；那就毫無缺憾

了。（註十八）

而且，安見得不能擴而廣之，在國內其他都市，如南京，廣州，漢口，重慶等地，也創辦此類院校呢？一般實科院系，需要實驗室等設備籌辦起來，非常不易，而且很費錢。像文哲等科，祇要有些基本設備，就行，教授也比較容易聘請。

另外，還可以注意的便是多多創辦公教中學，實際上青年的普通學識，全是在中學時代養成。這時陶鑄出的定型，大致可以終身不變。青年的人生觀，也多數在中學時代獲得。這時代的青年，最易感化，使其走上公教之路。

中學教程，本格地必須涉及上述一般文化問題；至於大學教程，就假定學生這些基本常識，已經具備，不再多講了。所以，大學新生入校時，思想已經固定，而往往具有牢不可破的成見；幼年的柔性已失，對於教育者的訓誨，已較富反抗性了。

外加，一般青年中，有能力讀中學的人數，遠較有能力讀大學的為多。中學的創設，也比較大學容易。全國各地，都可以設置，人員既可較少，又不必那麼需要專長。所以，結論是：此次戰後，我們必須對於發展中等教育一事，予以特殊注意。

增設中學，以大都市為尤宜。因為那裏招生較易，從而效果也較大。一所人數一千左右的中學，其成果可略等於十所人數一百的；可是經常費却可節省很多，所用職教員也可以較少，而其功效反可較大。大城市裏的一般人家，其社會水準，較高於內地；有能力受高

等教育，升入公教大學的學生，也比較多。學生畢業之後，較易覓得有前途的職業，較能在自己周圍的人羣裏，發生影響。

又由於大都市裏，教育界人材的集中，凡致力文化傳教工作，或新聞事業的人，要想物色賢助，也容易措手（註十九）。

以上應行創辦的教育事業，如此之多；當非單獨一個教區所能勝任。各區主教，應要求其修會的協助，尤其是一般專辦教育的修會；這是歐美各國通例，無論已在中國立會的，或是尚未來華立會的，都行。讓這些修會，自己負責去設立學校，自己去勸募經費；同時當然受各該區主教的監督。

（註十四）我的意思不是說確有這樣的公教學校。這不過是一種容易表示我的意思的說法。

（註十五）見震旦雜誌一九四三年頁九二三 R. P. O. P. i. e. e. 著蘇梅評傳。

（註十六）「公教高等教育機遇，爲對一般教外生施以基督化的感應，會特設自然哲學，或普通倫理學，或職業倫理的課程，列爲全體必修科。冕伯英神父 R. P. Payson 的「醫業倫理學」一書，乃是在震旦大學所授講義的擴大本。又天

津工商學院中自天神父 R. H. Arden, 亦著有「倫理學」講義。」

(註十七)至於各公教大學，除對文化傳教的種種助益外。還可以加上高深學術之講授，所給予公教會的威望。新時代青年，都有一種崇拜科學的心理。教外人看見公教會在這方面所處優越地位，定可在一般文化和宗教方面，更容易接受它的感召。這和上述文化學術的發展云云，同爲純學術機關作努力，有俾於傳教事業的證明。

(註十八)輔仁文學院去年度有學生一三四四人：內男生八九五人，女生四四九人。

(註十九)據一九四〇年中華教務統計(上海土山灣出版)，知道國內各教區，在這方面，已作了頗大的努力。是年，全國公教大中學校，已有學生一萬八千五百零二。至於大都市裏，中學生的人數倒不易計算精確：因爲有幾處統計，沒把中小學人數分別計算。可是大略估計，一九三九年上海中學十三處，約得四四〇〇人；天津六校，得二六〇〇人；香港十二校，得一五〇〇人；北平八校，得一四五〇人。這成績已經很不錯了。這裏要申明，在各校統計裏，必須分清各級人數，例如：初中若干，外籍生若干；因爲在各大都市的公教學校裏，這些外籍生也頗佔相當數目(至於暫反教人，在國內所辦的中學校共計二六一所，約有學生五萬人，相當於全國中學生總數的十分之一。他

們在上海有中學二十四校，香港二十三校（據一九三九年基督教教務記事
Chinese Recorder）

第二節 學校與公教文化人訓練

公教中學與公教大學的使命，不僅是對教外青年，施以公教化的感召，還應該替聖教會培植文化傳教事業上所需要的工作人員。

公教新聞事業，出版事業，一般宣傳品，對智識份子的社交聯絡等，應由什麼人去負責呢？自然是公教學者了！外國傳教士，因為他是外國人，並且永難完全操縱住中國語文；在這方面，祇能盡些推動，組織，協助的責任。本國司鐸的活動範圍，祇可以比較廣大得多。然而他又受着正式神職的牽累，不得專心此事。所以我們未來的著作家，未來的政論家，未來的教授們，更應由一般受過大中教育的世俗信友中去找。所以公教教育家，尤當對他們特別注意。我們應該指導他們，獎勵他們的學業；如有著述家，小說家，政論家的天才，要設法去發見，去培養他們，並予以練習的機會。

中國新文化運動，不願守舊份子的反對，終於推翻了古老的死僵的文體；代以生動，柔和，而清楚的白話。目前的出版物——書籍雜誌，報紙——幾乎全是用語體文寫成的。所以在公

教學校裏，也要儘着部章所允許的範圍，以語體文爲主。學生作文時，應鼓勵他們使用白話。千萬不可照一般學校辦法，給使用文言的學生，特別多打分數。這無異把學生對研究語體文的功夫，抵轉到「古文」上去。而他們在未來的文化工作上，却是非用現代語體文不可的。

上文說過，文化傳教主要方法之一，就是新聞事業。我們既然要辦報辦刊物，就得訓練合用人材。所以必須在公教大學裏，開辦「新聞學系」。例如輔仁大學，事實上已有新聞學課程，現在祇須加以擴充，一面再去獎勵公教生，尤其那些露出有些文藝天才的青年們，選修此系。

爲此，得讓他們認清，這宗職業的好處。就目前而論，他們對這一行，好像不感興趣；公教生中，竟沒有多少人聽這課程的。因而，我們一方面急需創辦新的報紙，一方面竟有才難之嘆。

在教育機關裏，陶育青年的主要因數之一，就是師長的人格感化，這是不憚詞費的。爲此我們應竭盡全力逐漸增加公教教職員的人數。至目前爲止，因爲事實所迫，所有國內公教大學的教授團大多數仍以教外學者來組成。他們的思慮如何？影響如何？不見得總完全適合學生向上的需要吧！因此不但爲教外生，並且爲公教生的補充教育也要用各種研究會，各種講演會，和神職專教授的個人感化，去補救施教上的缺陷。我們應盡心稱揚那些抽出授課供職以外的餘暇來盡瘁此項工作的神父們。很希望他們人數能够日漸增加，能够卸除其他職務，專心致力於此。

成立公教寄宿舍，或學生公寓，也是對大學加緊感召工作之一法。這類寄宿舍，可以專爲公教生而設，那末，它們的使命，就是防護其德性，養成其熱心，使其日後能够負起本業上，文化上，社會上，教友的任務。或者也可以專爲教外生而設，那末，宗旨就是爲防護他們受到壞的影響，使他們與神父與聖教會接近，並完成其教養。或者還可以兼此二用。

北平等地有私人設立的補習學校，專爲替落後的學生補習英算等課程，成效頗著。我們也不妨在這類寄宿舍附帶聘任幾位補習教師。他們也可以幫助我們對於學校青年施以感召。經驗證明，這類補課制度適合需要，因爲它能讓這些教師解決生活問題。我們這樣設法處處投合青年需要，處處替他們幫忙，自然可以使青年們接近我們，把他們領向福音。

第三節 留學生

公教學校的學生，在本國讀完中學或大學之後，若能把他們，至少最優秀，送到歐美各公教大學去深造，顯然是很有益處的事。留學制度，可以開擴他們的眼界，增長他們的智識，提高他們的資格與名望，使他們回國之後，更能爲社會宣勞。

我們應當鼓勵哪一類的青年到國外去呢？首先，是我們發見其有任教的能力與志願的那些青年。無可諱言地，在相當長久的未來，國內的大學教育還難以及上歐美著名大學的水準。這種補充的游學制度，對於志願獻身高等教育的人，至少在某種專門學識上，幾乎是不可少

的。

其次，應該遣派到國外留學的，是那些由其所學科目以及才能志願，皆具有後定能對本國同胞發生更大影響的青年。所以得把優先權，給予那些教材料做公教著作家或譯學家的人。我們的選擇，應以自己預定的目標，亦即文化傳教工作為準。所以在分配獎學金的時候，應將未來的教授，作家，或事業家們，放在普通技術人材的前頭，除非後者同時也具有口語或筆墨，從事傳教工作的志願。

至於自費留學的青年，不分教內教外人，都該設法把他們介紹到最優良的公教學校裏去，讓他們能夠受到一種精實的公教教育，能夠受到公教環境的薰陶。要達到這個目的，我們應與國外公教大學保持着若干聯繫。

國內方面在大學區的都市裏，應設立留學事務諮詢聯絡機關。這些機關負責替學生，學生家長，和一般教育家搜集各種有用情報。對於國外各大學院系的課程綱要，必修選修科目，修學年限，證書學位之頒給，入學手續，實習制度等，都得有詳細的調查。還有經濟方面如：註冊費，考試費，書籍費，校內校外食宿生活等費，各需若干？旅費，匯款方法，假期的利用與花費等，又各需若干？也都得瞭如指掌。

這類機關也應與國外各大學當局以及當地留學生管理處取得連絡。由他們負責招待留學青年，幫着他們辦理各種申請手續，指導選課，介紹補習功課；尤其各該國語文，更是乍到時的

一大難關。留學青年在學年和休假中的精神方面德性方面的修養，也應由這些管理機關去負責。

假使我們能够有這樣一個諮詢機關，不但國內公教大學的學生，連非公教學校的學生，都可以由我們介紹到國外公教大學去，豈不是能使中國和聖教會，兩受其益的事嗎？

而且這並不是一種幻想。例如：比國的魯文大學，素以學術水準特高，著名世界。在該校各院系求學的中國教內教外學生，人數已很可觀。並且在該城已組有替中國同學服務的機關。戰後自可與國內的聯絡機關通力合作。其他歐美各公教大學，或專門學校，也都可照此辦理。

第四節 畢業生之指導

公教大學學生，一旦在本校畢業或從外洋回國之後，仍應受到我們的關切和協助；我們得繼續注意他們的精神道德生活；設法替他們謀求能以發展抱負的職位，鼓勵他們在文藝方面及其他方面的活動。把有意義的創見去啓示他們。有才能又有志氣的青年，不可聽其賦閒。我們是費了那麼大的氣力，好容易才把他們栽培出來。務必設法善爲利用，藉以伸張公教在國內的勢力（註二十）。

事實上，國內各公教大學對於畢業校友及其家庭生活，職務，工作等，不繼續關心。所出校刊，往往藉作畢業同學彼此連絡的機關刊物，而發表各人消息給大家看。校務長，教授以下

，與舊日弟子，都保持着密切的往還。震旦大學甚至藉電台廣播，向舊校友作定期談話。遇有某教授路過某地時，常有當地校友會招待款叙。輔仁大學每年舉行返校節，邀請畢業校友，與母校重溫舊夢。遇機會還由舊日師長分訪各地校友。因此往往有出校後領洗的。

這一切都是非常好的辦法，因此這類校外聯絡的重要，無論是關於國內出校生，或回國留學生，決無所謂形容過甚。尤其因為公教智識份子，慣常有一種孤獨生疎的感覺。他們的人數，是如此之少；其他教友，又大多數屬於另外的社會階級，不及他們的高雅，這也是難免的現象。各堂口的神職班，意識地要用折衷辦法，遷就一般教友的程度；往往沒有工夫，也沒有心思，沒有興趣，去特別照料這些有學識的信友。

就另一方面說，他們却需要特別援助。他們要發揮潛力，就得摻進大衆生活裏，和教外人多加聯絡。於是便難免碰到各種問題。他們會聽到能够淆惑自己，影響自己的各種理論。因此他們需要明智的導師，替他們解決疑難，答覆問題，選擇讀物，指引他們的思想與良心。

這個，必得有明白此項任務之重大性的司鐸們，毅然負起艱鉅。這類人物在隸於高等教育機關，或在一般合辦事業裏，或因某種情勢，而與智識份子易生接觸的神職班中，可以找到。關於這方面，各大都市教會辦事處（候房）的人員，似乎可以盡些力。

這些司鐸，無論是做什麼的，不但對自動來找他們的青年，要善予接待；還要惠然先施，去鼓勵他們，關心他們本人，和他們的事工與努力。他們應該在這些公教文化宣傳員的心裏，

保持住家徒碎火。

同時不妨替這些教友組織些小集團，像教義研究會，或公進會學術部之類；讓他們彼此獲得幫助，彼此商討，彼此協力。這樣，他們便能集合在一位司鐸指導之下，時時用超性的理念，去策勵他們。這樣可使他們自身和他們各種舉工，在文化上傳教上的效率，都可受益不淺。

從這些討論現時問題現時需要的集會裏，定能湧現出新的創見，去適應傳教上的需求。假使這些在俗信友們，都已加入下文所述的「文化工作協會」，那末這類小的集會，更是輕而易舉。

(註二十) 此次戰後，由於復興與工作的需材孔亟，與因近年教育衰落而起的人材荒；公教大學所造就的人材，必能很容易找到有意思的位置。這是一個可乘的良機。

第九章 本籍司鐸之培養

第一節 培養之必要

在俗信友，爲贊助文化傳教工作，尙且需要準備與訓練，那麼，這種訓練，對於沙撈越人，尤其是必不可少的迫切需要了。

司鐸是「天主的選民」。他們是基督的宰輔，是主的助手，是他救世工作中的繼續者。聖教會所受往訓萬民的使命，一大都轉卸到他們身上。司鐸們是公教會的傳話人，是派遣到外族中去的委員。他們得用她的名義，使人認識基督所付託的教旨。

在俗信友，雖也參與教會的工作，但那只有次要的。一個信友有其他應盡的責任，其他應操勞的事情；他有家室，有事業，有物業利害。至於司鐸呢，他把自己整個時間，精力，生命，都已獻給傳教事業。他正當能專心於此，才脫離了世俗，捨棄了家庭，屏除了自我。他是天主的人，教會的人；教會所爲的任何使命，任意去差遣他。所以在中國歸化的事業裏，在宣傳福音的工作裏，他才主要是負責任人。

這些話，對於一般的司鐸，不分中外籍，都可適用。但是斷難易見的，在所謂文化與教裏，要想對全國發生深刻而廣泛的力量，我們的中國同道，自然比一般客籍司鐸，佔着很大的便

宜。

第一，他們是本鄉本土長大的。中國是他們的父母之邦。中國人民是他們的同胞。他們彼此都是一家人。每個民族都有它個別的精神，性質與心理。這固是各國皆然，而於中國爲尤然。中國民族的個性，如此之豐富，如此之特殊，如此之複雜，又與其他種族，如此之不同。所以遇到同一問題，對着同一事變，一個中國人和一個外國人，會起不同的反應。那末，中國司鐸的思想，感覺，反應，却會正與自己同胞不約而同。他本來是他們當中的一份子呀。他意識地能體會到在某種意圖，某種傳教方法之前，自己的同胞會生出何種感想，何種反應。

並且，他們對本國語文的素養，遠在我們外籍人以上。外國傳教士，任他天資多麼好，在他用功如何勤，任他研究中國語文時，消耗過多少光陰，幾乎仍然不能寫出通順而漂亮的中文，讓有學問的人看了顧限。

外國傳教士，決難自由使用中國文字，替雜誌或報紙撰稿，或用中文著書；除非有一個翻譯人，或一個校訂人，幫他的忙。更有甚者，外國傳教士絕少能够操着相當流利的中國話，在電台廣播，或在教外有識聽衆之前，起立致詞，或作一次公開講演。

可是文化傳教工作，却主要地是藉着報紙，刊物，演說來實幹的，所以外國傳教士，要想致力此種工作，事實上非常困難；非然一位中國助手幫忙不可。反之，中國司鐸祇要他所受的文學訓練與本國一般智識階級相等，便能很隨意地使用着本國的語言，從口頭和筆端，散佈基

野的眞道，解決時下的難題。

所以惟有中國本籍司鐸，才正是文化傳教工作的主要人員。尤其他們應肩起這個責任。

第二節 德性之培養與本國學識證書

但是要他們負起這責任，必須事先施以充分訓練。第一，是德性上的訓練。上文說過，要作文化傳教工作，必須和預備感化的人有儘量廣闊，儘量親密的私人聯絡。世俗人與外教人多數浸染着是世俗思想，貨利思想，懷着權勢心，虛榮心，以及自主，奢華，逸樂，官感等欲望。司鐸神職應加提防。若與他們不斷來往確是一種危機。

要抵抗傳染中外司鐸，都該懷着一種極深的超性精神，都該是慣於祈禱的人，讓一種極大的神火，極大的謹慎，引導着自己。因此，必需一種強有力的德性培養。

另有一個原因，使從事文化傳教工作的司鐸們，不得不具有非凡的聖德，而必須諄諄誦習之的，就是：要想獲得智識階級的重視，一個熱誠的離俗的簡單的生活，比學識修養所生的效果，也不在以下。少年中國，倡導着爲民衆獻身，爲社會服務，廉潔自守。巴金及其他的現代作家們，都鼓吹着爲一己信念，不惜犧牲一切，放棄一切。「新生活運動」，提倡着自我修養，與公民道德。那末，智識界的宗徒，也和民衆運動的宣傳家一樣；想獲得人家的真心信服，尤其在私人交際上，非得自己的生活，眞能反映出所要宣傳的原則來不可。生活的聖潔，本身就

是一種良好的傳教方法。

對中國司鐸施以充實的德性培養，固屬要緊；而予以純中國式的普通教育，至少與其本國一般智識界同等的，也是當務之急。

總得讓一般中國人覺察出來，公教司鐸在教育程度方面，至少與他們相等。一位普通學者，若覺得某人的學識不如自己，那他決不肯對這人的著作或講演，加以重視。而我們司鐸們非具有令人佩服的普通學識，尤其本國學識；是不能讓自己同胞們起敬起畏，從而發生感召力的。

所以國文課程，在公教修院裏，應佔重要的位置。若說寧使教會通用的拉丁文修習上受些影響，當然是一個重大錯誤。因為那樣會把中國神職班，置於較低於全世界公教神職班的地位的。可是若因學習拉丁文而犧牲國文教育，至少也是一個同樣糟心的錯誤。因為惟有國文程度好，才能使他們在中國人眼光裏，獲得傳教必需的信任與資望。（註二十一）

凡公教修道生都應對本國現代語，能够運用自如，能說出，寫出一種清通高雅的語言。爲此要授以現代著名作家，寬博而精粹的選集。又因現在流行的選集中，每有德育較差的章節，我們必得另印較好的本子。（註二十二）

爲完成修生文學素養，只靠精讀選集是不敷的。必須再擇其以文筆擅勝的全書去瀏覽。有一個很妙很富教學性的方法，就是讓學生們練習著作讀書摘要，作某書的分析研究，批評該書

的內容與形式。要他們練習着寫出極順很漂亮的現代文。

修院的教員，要慎重選擇。中國教師，無一不是父或在俗人，非得受過專門的大學教育——至少那些担任教高三班，至修辭學爲止的——這樣，才能才修生以修習的文學科學的培養。

外國教師，都得對中國學術，有良好素養；中文程度；也要以能向中國讀現代書籍爲度。

有人爲改善修院教育起見，主張創辦「國際聯立小修院」，收錄自第三班以上的修生；這也不爲無見。這樣，既可節省人員與經費，又可選聘較爲優良的教師。並可成立比較完備的實驗室。

課程方面，要包括政府規定的高中各科標準。這樣，才能使修生們，在未入哲學院以前，所受的國文科學教育，相當於一般初入大學的新生的程度。對於他們的國文程度，尤其要置重。關於中國文化，中國歷史，中國古代與現代學術等一切的要點，修生們都不應有任何隔膜。他們應具有古代文學，哲學，藝術的概念，熟悉本國的大文豪與大人物。要教他們知道祖國可愛，使他們願爲祖國效力。

假使六年的小修院課程，足以完成上述的培養，那再好沒有。否則，別怕再延長一年二年；好讓未來司鐸們的文學科學程度，趕上一般在俗人的水準。他們自己的期望，聖教會的聲譽，傳教的效率，都以此爲代價；其實，世界各國，預備升鐸品的人，不是都要具有與此相等的程度嗎？

然而在中國，位望之獲得，不是單靠真才實學的。在極大限度內，也靠着所得的證書或學位。公教司鐸，儘管實際上很有學問，若是沒有什麼畢業證書，大家會不承認他是令人信服的。除此以外，政府方面，對於甄別某種職務的資格，也規定要呈驗證書。公教司鐸，倘若沒有畢業證書，有被政府禁充校長，乃至普通教員的危險。那末他們的地位，反而不如一個初中畢業生了！

公教司鐸，沒有這張正式憑證，在公務人員跟前，會自覺怯弱，不敢自信；遇着他們應勸化的智識份子，也不敢接近。反之，若有了一張證書，便使他們心裏有些着落；在本國人眼裏，也有了身份。

要得證書，也是鼓勵修生用功的一種刺激方法。並能幫助修院教員，提高課程水準，保持相當程度。人文科修完時，藉此淘汰曖昧的聖召，也較易爲力。自覺無受精品志願的青年，出院時若有這張證書，也可以謀個位置。況且，在歐洲各國，凡屬司鐸，大概全有一張正式證書。並且，要入大學，也非有中學畢業證書不可。這是中外皆然的。

修道生畢業證書有用處，固是無可置議的；但是如何設法替它劃線，却是非當棘手的問題。政府方面固肯頒給證書，同時也要求核准學校組織，稽查授課情形之權。那末，我們就得遵守一般辦學法令，接受官方視察，容忍行政手續上的種種麻煩。然而我們修院內部，如何能容納教外公務人員的干預？何況他們對修院教育之性質，一無所知，有時甚至不懷好意呢？

上海方面，預備修道的學生，雖與在俗學生隔離；然受課時，却在「徐匯中學」，與普通學生一同聽講。這個辦法，乍看好像很不錯。可是非難它的，也有相當理由。先說教廷方面，就有不少訓令，屢誡初學修生務與世俗學生完全隔離。比國方面，雖通行混合制，然而好像那只是一種寬容辦法，而且，在比國公學念書的學生，幾乎全是出自信仰極深的公教家庭。家庭環境，社會環境，也都充滿着信德。這裏，却不然，我們所處的是一個外教社會，環境完全兩樣。並且，一望可知的，假使這制度普遍施行起來，須要多麼大的毅力，多麼嚴的紀律，和不斷的注意，才能防止兩組學生發生密切來往。偶有疏於防範的地方，則修院風紀，勢必大受其累。

也許，最好的解決方式，就是由公教會與中國政府，成立一種協定，特許各修院發給正式證書，或保送各院畢業生參加甄別試驗。

無論如何，這問題極端重要，而必須鄭重考慮，覓取適當解決，甚至甘受若干犧牲，也在所不計。公教教育前途，司鐸書院前途，文化傳教事業，教會的聲勢，全與這個有直接關係。

(註二十一) 還用提歷次教廷傳教通牒裏，關於此事，如何一再申述嗎？(參看一九

二七年 *Enchiridion clericorum* 四六一號；又關於神職班學位問題，見

同書五九三號。

(註二十二)上海方面，耶穌會神父，已經編印出一種中學和修院的適用的叢集。又聖母聖心會士數人正計劃着另出其他選本。

第三節 大修院時代的培養

公教司鐸，不但要受到一種特別完善的純中國式的中等教育；即其哲學神學的修習，也要儘可能選就本國的特殊情形。這種培養，要比較歐洲各國有點兩樣。尤當注重今日中國所常談到的哲學問題與辯教問題。這在他們未來的傳教工作上，是必要的。若能把他們所學的東西，與現代書報雜誌中所申述的各項理論，加以印證，也未始不是一種使此項研究變爲有趣，生動，而具體的方法。

講授神學與哲學的教授們，應該對於中國青年認作思想界權威的作家，像梁啟超，孫中山，胡適，林語堂，蔡元培，魯迅，巴金諸人的著作，都相當熟悉。應能認出他們所稟賦的思想中，何者正確，何者謬誤。公教司鐸在文化傳教工作中所能遭遇的，不外乎這些作家所激起的思潮。他們必得先弄清楚，這些思潮中所含的真理與謬見；以便能夠隨時利用前者，駁斥後者。

爲了同一原因，凡西洋哲學家，在中國現代思想上，發生過較大影響的，也都要對其謬妄

之點，特別加以研討。遇到講授他們素所反對的哲學論據，更須隨時加以批駁。在這些思想家
中，可以特別提出盧騷，尼采，黑格兒，馬克斯，柏格森，詹姆士，杜威，羅素等。

在這些現代謬論之外，還有中國古代之哲學宗教學說，也得秉着研究公教神哲學之便，加以觀察，藉公教神哲學的光明，加以評判。

所以我們得稱揚各修院教授們，在他們所發表的講義裏，隨時留意替這些學說，闡出些篇幅，加以討論。

以上所談的，祇是一般修生所應共同受到的培養。經此培養，可以把他們造反熱心而盲學的司鐸；能夠在各堂口執行職務；有所建樹；能夠和受過教育之教外人，作勝利的辯論，而對其發生感召力。此種培養，可以發揮他們的文藝天才，至少使其中的相當多數人，有能力幫助翻譯工作，或向公教刊物投稿。

第四節 特殊培養

但是，如上所述，文化傳教事業的需材是無限的。我們需要受過特殊訓練的人，來任公教
修院和公教高等中等教育機關的教職。我們需要職業著作家，講演家，辯論家；需要思想界和
事業界的人物，有能力加入文化運動而予以影響指導。這些公教勢力的代表，日後要在這些運
動中，遇到現代中國的主要領導者，亦即國內的文學家，著作家，哲學家，教育家社會學家，

政治家等。應由他們去發現流行理論中，所含之善良或危險的成份。於本國發展上，有益或有害的成份。

他們必然地會碰到種種內含危險性，而外形很迷人，很宛轉動聽的謬論。他們必得知道，如何去揭穿這些謬論，暴露它們的狡點，用結實而能服人的論據，去駁倒它們，並指出它們的毒性影響來。

他們須要想到提出於中國青年之前的，有關宗教方面，道德方面，智識方面，經濟方面的種種問題。須對此一切，形成獨特的見解，尋求答案，釐定計劃，以便堅決地爲本國福利去工作，爲其物質建設，精神建設去努力。

這些，都是未來公教著作家，辯道家的事業；而這些著作家，辯道家，又大部份要向中國神職班中去募集。誠如上文所說過的，口頭筆端的傳教責任，主要地還在他們身上。

當然，這宗文化傳教的工作，不是任何司鐸都應該幹的。這假必須有特別的才能，還必須受過特殊的培養。當事人又須經過該管神長的特委。外籍傳教士也是如此。

爲訓練此種文化傳教人員，蔡總主教在北平成立了一座「司鐸書院」。這個教育機關，正適合中國公教目前的一種需要。它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

目前辦法，是由各教區主教，就讀完神學的青年司鐸裏，選出幾位認爲最適合於辦教育辦文化事業的，具備着明悟方面，德性方面的條件的。然後派遣他們到北平司鐸書院去研究專門

學術，獲得大學學位。任何人都容易看出，這個學位，和這種特殊培養有什麼好處。它能替中國公教會造出教育方面，文化，社會專業方面的專門人材。

不過，除去這種專門的訓練和學位的獲得以外，司鐸學院制度另有一種值得特別指出的功效。那就是它所撮合成的，書院中的學生與大學中學術界人物的接觸，以及由接觸而自然會發生的相互關係。

我認爲此種接觸，此種關係，非常重要。前文說過，要用福音的酵母，釀起麪來，必須摻和得很透，要與層層麪塊，直接地接觸。過去，公教神職班，連公教信友在內，往往在本區堂口內，閉關自守，與高等教育界人士絕少往還。因爲公教人一向置身文化運動之外，以致中國在其蛻變過程中，幾乎絲毫未受公教會的影響。

可是，現在這神職班中的優秀份子，竟摻入了一個大學的生活裏，照樣註冊選系，和明日的智識份子，研究着同樣的學程，注意着同樣的問題，遇着同樣的困難。彼此終於相識，終於結成良好的同窗關係。

我們所應參加，應影響，應領上真理之路的文化運動，其發生是在一般大學裏，其醞釀表現也都是在大學裏。未來的國家領導階級，也是在大學裏養成。所以公教內從事文化工作的人員，也要在大學裏開始學習，認識這些運動的意義，加以研究。在那裏，弄清楚當前的各種課題在那裏，與智識份子，開始初步接近，他們在大學時代所結下的交情，對他們未來的傳教工

作，可以有莫大的助力。

況且，他們自現在起，已可開始實習這種工作。他們與他們的學友比較起來，具備着一大優長，就是精通哲學和神學，並且氣質的變化，業已成熟，能以發生一種潛力。當然這種實習工作，應極端謹慎，極端機密。但經長上的指示，鼓舞，與監察，這種實習傳教工作對於他們本人，和他們的學友們，兩皆有益，並且，可作未來正式工作的保證。至於有些修生被派到羅馬，受特別專精的神學哲學教育，向聖教發源地採取較深的公教精神與羅馬精神；因其所受教育，程度較高，更是現成地作未來大修院教授的人材。

羅馬因有研究高級神學的便利，固是中國一般大修院教授最理想的養成所，但在回國之後執教之前，這些未來教師，若能再在輔仁大學度過若干時期，補充一下他們的國學修養，那也是十分有益的事。

在羅馬，他們需要把全部時間，用到「內學」的深造上。固有的國學根抵，也許尚能保持住；至於進境，就很難說了。況且他們還要乘着留學期間，同時增進其外學常識。因此，在他們回國之後，再補修一點國學，也是很有用的，這樣便能把預教的神學課程，貼合國情，能使自己的教學，與國內各種思潮，保持着若干聯繫。

可是，也有些人認為，必須在中國國內成立一所「高級神哲研究院」，專為已讀完普通神哲科的司鐸們，預備担任修院教職的。這方面已有若干嘗試。臨到神學修畢，選拔合格學員之

際，不消說各院當局已有成竹在胸。學程，標準，學制，也可遷就國內的特殊情形和特殊需要。• 本國學術，也仍照各人選定的專科繼續研究下去。研究生並可利用與本國智識界的接觸，熟悉當前的國內思潮，和智識階級的心理。

第五節 問題之重要性

國際神職班的培養問題，在一切有關文化傳教事業的課題裏，是頂頂重要頂頂迫切的。它應該佔據中國公教會各種變心事項中的第一位，而凌駕其上一切。需要立時解決，任何犧牲在所不惜。

什麼整個中國的歸化啦，什麼對智識份子宣傳啦，什麼引導他們歸向公教啦；這一切，非得中國本籍神職班，與世界各國一例，能與一般智識階級的教育程度，達到同一水準，終是難以實現的空想。本籍司鐸的活動，有賴於他們的勢力與位望。他們的位望，有賴於他們的聖德與學識。讓我們的青年司鐸，在普通學識與本國學識上，還不及一個高中畢業生，那是難以索解，無可原諒的事。

同時，中國司鐸自身，也感覺到此種需要。很多老一輩的覺出來修養不足的苦處。小一輩的，熱烈地盼望受到相當教育，有時甚至不耐煩的要求着。這種願望，是十分正當的。

上文說過，自然不該因此而使他們神修與聖職修養上的任何什麼，連拉丁誦在內受到犧牲

；因爲那種辦法，是讓他們出乎各國神職班之下。但是，他們的修養，因要與外國司鐸平等。而在本國學識上，又要與本國學者平等。

一件證明，在公教教務聯合會担任修院部專業的呂登岸神父 P. J. Nathan 曾有系統的調查，在一九三五年的「教務叢刊」上發表。（註二十三）他肯定地說：「各修院的第一目標：就是將本籍神職班的程度，提高與其他各國公教神職班的水準；這一個，在國內若干修院內，已經頗能達到。而第二目標：就是將它提高本國智識階級的水準；這一個，好像只有「幾個」小修院僅能達到。其他的，都還沒有達到。」

自那時起，當然又有了若干進步。但不論目前環境如何，應有的改革，仍須設法完成，並且要趕快完成；而各教區也應把這件事放在心上，儘先結記着它。傳教事業的前途，惟此是賴。（註二十四）

青年司鐸，學成之後，尤其在最初幾年，應繼續受着開明，而慈愛的關切，鼓勵他們的初步傳教嘗試。得讓他們藉着瀏覽書報，明瞭國內一般動態，得知一般文化問題，隨時注意，隨時合作。有的在教育事業裏，有的在執行神職或出版事業裏，各自覓取相當機緣。有的可以從事譯述工作，或著述工作。大家都得推廣自己的聯絡，盡力使之有利於傳教事業。

新近創刊的「鐸聲」雜誌，是專供司鐸們閱讀的刊物。它的使命非常重要，就是讓讀者明瞭時下各種問題，明瞭各人應盡的責任，明瞭各人應具的信念。鐸聲剛一創刊，已獲得多數的

好感，興奮的支援。視它前途無量。(註二十五)

(註二十三) 見呂神父 R. P. Rutter 著「中國小修院課程標準」一文，載教務叢刊，

一九三五年，頁六二二——六二七，又七〇二——七一五。

(註二十四) 以上所說關於司鐸培養的話，在相當比例上，對於一般助修士與修女，也同樣適用。最近見若干位修士修女在輔仁求學，成績也頗好，這是令人欣慰的事。希望這榜樣有人繼起師法。倘若他們或她們不經認真訓練，則其服務能力，尤其在教育事業方面，當然是很有限的。

(註二十五) 此文脫稿多日，見鐸聲一九四四年八月號更登出一篇吳宗文神父的「中國司鐸學術研究會」的組織草案內云：「以聯絡中國司鐸，彼此互相鼓勵協助研究學術，使聖教學術思想傳入中國社會為目的。」正與拙文各種主張，不謀而合。遺計畫，筆者完全贊成。

第十章 外籍傳教士之修養

第一節 特殊修養之必要

中國本籍神職班，固應對本國學術，有相當根柢，至於外籍傳教士的中國學識，依然也是必不可少的。一旦傳教士要到某國去開教，必須先受適合該國國情的特殊訓練。這種訓練，隨傳教國的國別而互異，到中國來的，到日本去的，到印度，澳洲去的，各是一種完全不同的訓練。這些民族各有其獨特的語言，心理。學術與文化；而其各自的發展，也不是循着同一路線；其所奉爲圭臬的思想，也各與其鄰邦，不相侔。

因此，凡是預備到中國來傳教的外國教士，先得花上相當的時間，去研究中國語文，和一般中國文化，亦即中國的歷史，哲學，風俗，制度，文學，藝術等等。

光是認識了中國的過去一切，還不彀。認識「過去」，祇是對明瞭「現在」才算有用。故此中國現在的狀況，才是我們應該盡先研究的對象。因爲調節吾人傳教工作的，尤其文化傳教工作的，不是別的，乃是國人目前的心理，期望，與趨勢，乃是國人目前所感受着的影響，所操心着的急務；乃是目前在文化的社會的各部門裏，忙碌着的種種活動，種種實驗。

正因為目前中國，在大踏步地向前邁進，受著各種不同學說的影響，而在尋求着一個新的文化，所以傳教士眼光的轉變，也尤覺必要。

這種專先的準備，對於一般傳教士，固屬必要；而對於預備從事文化工作，或高等，中等，或修院，教育事業的傳教士，尤為迫切的需要。

上文說過，公教學校與修院教育，必須適合現時需要。必得顧到流行的思想與理論。公教教育人員，應該對於國內新出書報雜誌裏所發表的一切，都很明瞭；否則，他們的教育是不會具體而適用的。他們必然無力防止青年蒙受毒性影響，養成其智力，以便他們日後能嘉惠本國，作同胞們的智識嚮導。

這種專先準備，尤其對於在大修院或大學任教的傳教士，特別要緊；因為他們日後要成為一般文化工作幹部人員的專門顧問。公教新聞記者，政論家，與著作家，投身在日常奮鬥的混戰裏，需要向若干的文化中心機關裏去請內行專家們予以必不可少的指教。他們乃是實地工作的人。總得還有其他專做研究工作的同志，事先把當前課題，預加推敲，搜集出種種資料，尋求得種種答案，讓前者隨時利用來應付急需。

還有公教辯道家們，不定那一天，要討論不定什麼問題，涉及不定什麼事項，不見得都有充分準備。那末，他們去請教誰呢？除了在修院或大學裏，專門研究這些辯道，哲學，神學，史學問題的那些學者們，還有誰可找呢？但是，這些專門學者，要想有效地幫忙，自然得弄清

楚這些問題究竟是怎麼在中國提出的，一般中國刊物又是怎樣爭論的，才不致「隔靴搔癢」。

第二節 語文研究

新傳教士的修養，首先着重語文學習。他們要和傳起教來能够勝任愉快，絕對必須先把中文學好。這固必要性是無須證明的。它太顯然了。倘若不學着用中國話和中國人接談，讓人容易明瞭自己的意思，那咱們到中國是幹什麼來的呢？

爲此原因，很多傳教修會，在北平和別處，設立了若干華語學校。青年傳教士，在派到該管教區以前，都得先去那裏正式按方法學上相當時期的中國話。此種學校的創辦，自然是一大進步。無疑地可使新進教士沾不少光。但成問題的是：要讓傳教士們獲得相當國語程度，尤其是寫體文字方面的程度，究竟需要多長時間呢？

要下個斷語，我們可以拿普通傳教士需要學會的現代「語體文」，至少以能閱讀書報雜誌的程度作標準。這樣便可把「文言文」除外。有的傳教士固可自行深造，研究到那個地步；但大多數只要把語體文，亦即今日出版物中通用的白話文，弄出個頭緒，也就够了。

這種新體文，是一般傳教士都應該能够自由誦讀的。試想，傳教士約到中國來，本爲幫助中國人解決疑難，想把中國領向公教，想做中國人的顧問，嚮導；而居然到死看不來中國書報！這無異於甘做中國智識界的門外漢，甘於無力達成自己的使命。這够多麼洩氣！在中國學識

方面——就一般民衆而言，只有這個真學問——我們不但在蒙養階段，簡直是連寫字看書的都不會造地文盲！那自然會使我們在傳教工作上，失去旁人的信任。

而且這種現代文、新傳教士應於遷往工作地點以前，完全學好。僅靠在華語學校念課聽頭兒，略有一知半解，便想到傳教地區去再繼續學習，那是不够的。這種辦法，對於大多數的教士純粹是一種「烏託邦」。爲什麼呢？因爲研究中文，是十分困苦的事，需要緊張的努力；至少每天得花上四五小時，再持續到若干年。即使在華語學校連念下去，我想平均也須要三年的苦功，方能閱讀現代書報。

倘若才讀上一年，便被神長派去供職；怎能再勻出這樣多的時間，來研究寫體文呢？還不是立時被職務和學話的忙碌消磨了去。

所以要學習「寫體文」，必須在一所華語學校裏，經過悠久的時間，和不斷的用功。假如傳教士在出發傳教之前，已能自由瀏覽書報，他們定會自動保持並增進已有的程度；還只須不時看些書報，明瞭各種思想制度的進展就行了。

但是，假使他們沒有在預備學校多念下去的耐性，隨便學了一年，便跑到傳教地方去；那不但寫體文無從進修，怕因爲拿不起書本連已學會的中國文字，中國名辭，也要逐漸忘光；把頭一年所得的益處，大部份地失掉。所以在預備學校的期限，就一般傳教士說，最好定爲三年；至少爲那些有志願的，應該如此。無論如何，凡預備辦教育，或在入城市堂口供職，或幹文

化工作的，都必須如此。（註二十六）

（註二十六）按方濟各會以及耶穌會在北平所立中文研究院的學程，對一般學習者，已定爲二年，其中若干人，則定爲三年。自然，對於未來中國之前，已學過中文的人，上述學程，還須加以調查，合成一整個體制；那是不消說的。

第三節 普通中國學識——證書

除去論文修養以外，在一般預備學校裏，似乎也應該添設些普通中國學識的課程。分佈在三年以內修完。在這全部課程中，當然以語文之學爲最重要，然而也得與中國古代和現代文化等課程，同時合授。這些課程，應該能關於中國的哲學，關於中國的宗教及其學說，其影響，與其現時傳佈情形等，給予未來傳教士們，若干扼要的概念。應該包括着中國歷史、地理、文學、藝術、近代名著、新思潮、以及智識界、社會界、教育界的動向等，傳教士應對於中國政制，現行法令，各級教育現狀，社會組織，言論機關等略知梗概。最後，他們對於公教各種事業，各種待決的傳教問題，及其個別重要注與夫聖教會期待他們努力的一切，都十分明瞭。

關於此種普通學識之講授，北平方面各預備學校，似可隨時約請政界，文化界名流，舉行各種問題的個別講演或連續講演。講演時可用英語。要主講者人物整齊，可以選請中國方面各

學術團體，如過去的中山文化教育館之類，接洽代約。這些團體，類多以對外宣傳本國近況，和研究當前學術問題爲宗旨的。

青年傳教士，如能親聽到中國名流演述中國現狀與其個人看法，那是極有意義的事。而且，這類學術團體與公教佈道人員的合作，於上文所提社交關係的締結上，必可大有裨益。

進而言之，也不妨把這些臨時講演，逐漸改爲正式的課程，再將這些課程，合組成一種漢學學院。至於院務組織，可以由各修會聯合中國政府合辦；課程綱要，共同議訂；畢業生也頒給正式證書。由政府承認其資格，傳教士若能獲得此種合法證書，則傳教之際，在一般民衆，一般公務人員跟前能以證明自己瞭解中國國情，自然可以提高身份，讓人佩服。

就目前而論，一般傳教士，大都具有高深學識。有的還是很高明的漢學家，然而在大部份中國人眼裏，他們只是些天主教佈道師，猶之乎和尚道士之爲佛道兩教的宗教師無甚分別。更因這幫和尚老道往往不學無術，連帶的傳教士也容易被列入愚昧無知之羣；尤其中國新派人物，又認定了科學宗教兩不相容，更使天主教人無以自見。假如他們的治學資格，能經國家核定，便不致使人起此種錯覺了。

誓反教徒他們，另想出一個別的主意：就是把他們在北平所立的華語學校，改隸於美國加州大學之下。改稱「加州大學中國學院」。

上海震旦大學，也想到了這個問題。該校爲外人特設中文研究班，於一九四二年十一月開

辦。校務長才神父曾表示有意將該班改爲永久性的組織。他說：「若把三年所授的課程，聯貫起來，成一個相當完備的系統。學生修養期滿後，經考試及格，授給一種證書，略等於巴黎「東方語文學校」所頒發的一樣，不見得是不可能的。（震旦雜誌一九四三年頁九六七）

北平方面，必要時，可以假定把這「漢學書院」或「中國學術研究院」附設在輔仁大學裏。但似乎仍以政教合作，另外設立爲妥。譬如由政府決定一部份教授人選，徵得各修會會長同意後，再正式加聘。中國政府，但凡有點意思的話，定肯關心這種組織，定願把自己對各種問題的觀點，對來中國傳教的外人，詳爲披瀝，請其協助。這樣就可成爲政教合作的發軔，日後定可有良好的收穫。

假使上項計劃行不通的話，可以設法在歐美各公教大學內，尤其是已有未來傳教士在修習着中文的地方，開辦幾處「中國學系」，像巴黎國立大學和柏林國立大學或其他地方的辦法一樣。譬如，在比國魯文大學，已有些未來傳教士，修讀神學，經常研究中文，這事便有幾分實現的可能。本來與其各人私下學習些中文，何如索性列入大學學制，開一個專系頒發正式證書呢？任何人都不能否認，巴黎東方語學校或柏林大學的畢業證書，可以給與領得的人，一種特殊資望與權威。（註二十七）那末，不會設法讓更多數的傳教士享此種利益嗎？事情並不難，祇須將具體而微的現成組織，加以擴大出具證明，就完了。

(註二十七)有的修會已派遣會士從此種學校去專修漢學，這是值得稱揚的賢明措置。

第四節 大修院或神學院時代的修養

個人認爲一入大修院或神學院便開始攻讀中文，是一個無可非議的良好辦法。自然，這種額外課程，不得妨礙其他正課；所佔時間，也不能過多。每週兩小時，似乎適合適。當然，要藉靠這點兒功夫，學會說中國話，絕對不彀；但是本來用意並不在這個上面。想學中國話，必得親身到中國來，與民衆接近。這點初步研究，只是爲熟悉些中國寫體文字，以便未到中國之前，已認會了若干單字——假定是兩千字吧——能看淺近的書。想讓這初步學習，發生效力，必得專以白話常用字爲限，把古文用字除外；聘請教員，要選能幹些的，並讓他們專心任事，久於其職。祇靠臨時的教習，不易收什麼大效。此外，學程表也要悉心釐定，使之前後一貫，包括着自初學起至北平或他處中文學校卒業爲止的全部年限。用這方法，可以讓青年教士學習中文格外便利，其成績也可較佳。遇有特殊材料的，自應讓他們升入大學東方學系去專攻漢學。

未來傳教士的特殊修養。不僅是語言文字這一事。整個德育智育方面的修養，也都要以未來傳教工作爲指歸。本來造就人材各有不同，預備在聖教廣揚的本鄉本土工作的司鐸是一樣方法，預備到遠方外教國家使教的司鐸，又是一樣方法。同是開教，到未開化的民族裏去開教，和到文化古國像中國這樣地方來傳教，其需要與情緒是完全兩樣的。

甚至在性靈方面，其修養也得有一定進路。除去跟上文所論關於中國司鐸一樣，必須有一種極大的超性精神以外，還得對志願傳教士誨以忍弱與自制，應知壓服本性的鋒芒，隨遇而安，別想強人就己。公教愛德要求他們知道重視所要勸化之人的各種特長，竭力去發見這些特長，別想強人就己。公教愛德要求他們知道重視所要勸化之人的各種特長，竭力去發見這些特長，避免一切使人不快活，不好過，使人難堪，不安的舉動。他們需要有意識之德，力戒在意識中懷着一種民族優越感。絕不可有岸然自大的氣餒。應知有很多事情，如中國的人情世故，民衆心理，風俗制度等，自己是門外漢，要向人討教的。

負責教導的人——要力矯昔日的錯誤觀念，認爲傳教的人，不必有什麼真才實學，只要有心火，肯耐勞，肯苦幹就行。要再三說明，新傳教士到達傳教地域以後，所遭遇的課題，如何複雜，而必須專心加以研究；學識修養方面，如何必須加緊用功，竭力深造。

光是給志願傳教士作幾次幻燈講演，敘述下鄉傳教的困難，那是不够的。總得自培養初期起，就讓他們面對了各大傳教問題。原宗教，哲學，教育，學術；社會等不同觀點，給他們解釋在華公教會的使命。年青人非得時常接觸這類問題，不能燃起研究準備，求其解決的志願。非這樣，該管神長難以看出各人的心境與興趣，總得觀察過各人對這些問題的反應，才能選派特種研究生時，洞若觀火。要想這類特種研究收效，非得順從各人的傾向與稟賦不可。

自然，不消說，外籍傳教士，也與中國本籍司鐸一樣，絕對需要受專家訓練，得正式證書。

先說，爲養成大修院的師資，每一教理部門，如：信理神學，倫理神學，教律學，聖經學，禮節，哲學等都需要培植專家。一般教育行政問題，學校管理問題，教育心理問題，也得有深切明瞭現代思潮，各國最新實證的專家。這樣才能在中國有「斯界權威」之目，才能與中國教育界合作，並以公教精神影響之。此外，如社會問題，社會事業也需要專家；大學教育中，各科學領，也需要專家，總之，凡屬公教會在華事業，對國內進展能發生影響力，使全國，尤其智識階級接近福音的，都得有專家來主持。

此種專家訓練，標的要定得高。思想方面，我們叫專家，必須完全明瞭有關自己所選專科的世界最新理論，即使其原則不正確，也無妨；即使僅是個「時尚」，盲從的問題，也無妨。這些常識，對於他們在中國學者面前的聲譽和身份，是必需的。至於實驗方面，這些專家們不但要研究的多，還要見識的廣；要多參觀那些最估勢力，最有名氣，爲各種理論策源地的機關，例如：各大學，各研究所，各文化，社會專業機關，各學校，公進會組織等，各人注意自己注重的事項。若能在外國，尤其在中國，最著名的的大國，實習上一二年，那更是一種非常有益的補充訓練。

另有一種非常重要的事，就是他們在這類機關團體裏所發生的社交關係。這些關係，在他們一旦投身在中國文化傳教工作之後，對於上文所述的文化交流之發展上，可有極大裨益。因此他們應當去追求，擴張，保持，這些關係。

中國學術修養之重要性，因應諄諄誥誡，同時也不可忘掉一般學術修養；西洋學術的廣博常識，對於未來傳教士，也是必不可少的。中國的學者，決不會就中國文化學術問題，來請教他們。所能質問到他們的，無非是西方科學文物的最近進境。雖說中國是我們的第二祖國，而我們所傳的又是萬民同遵與任何個別文化形式無關的基督聖訓，但在一般中國人眼光裏，我們仍不能被認作西方學術文化的代表人。假使我們對於西方學術文物的進步，不得其詳，我們會使他們感覺失望，在他們眼裏自貶聲價的。

因此，傳教士們必須具有廣博的學術修養。若聽使志願傳教士疏忽此種普通學識，那也是一種錯誤；因為他們和現代中國人接觸時，這些學識是必不可少的。

非英美系的外國傳教士，對於英文也需要能讀，能說，能寫。因為英文已成爲一種國際通用語言，在中國亦然。因此各大小修院，也最好督促未來傳教士，把英文學好。

最後，關於上文神哲二科教學，在中國修院必須適合國情一節，對於外籍傳教士教養上，也要重加申明。神哲教師，對於中國現代思想最流行的學說，最估努力的潮流，也要越切瞭越。在教程內，要著重申述未來傳教士可能碰到的難題或謬說，俾作日後文化傳教工作和辯道工作的準備。這樣，不但中國神職班的訓練，連外籍傳教人員的訓練，也都可適應中國現代傳教事業的需要了。

第五節 教務雜誌

傳教士對於自己受過的訓練，在到達各個傳教地區之後，仍須加以保持與擴展。關於中文修養方面，有聖言會顯神父 *Fr. J. J. ...* 創辦，方濟各會干編印的「華語季刊」，可以作為自修的補助與鼓勵。但關於中國國內一般轉變，一般思想運動，以及與傳教有關的問題，每位傳教士，除須訂閱一種普通學術的中國刊物以外，還得有一種專為他們看的刊物，讓他們隨時明瞭國內傳教方面的種種課題。

現在國內已有好幾種專為傳教士看的西文雜誌。內容方面，涉及的事項也很廣泛，有神學論文，有崇修研究，還夾雜着討論中國種種新問題，或傳教問題的文章。倘使這些刊物，每一種各偏重一個特別部門，不更有些意思嗎？

反正，我們希望其中之一，完全負責發表一切研究傳教問題，和有關這些問題的具體情況，等類文字。故此，這刊物得讓傳教士們隨時明瞭各類思想活動，社會制度的轉變，學術界，社會的新趨勢，各區同道所用的宣傳方法，以及誓反教徒，佛教徒，共產黨人所用的宣傳方法，它得讓我們知道公教教育事業，宣傳事業，人材培養，社會福利事業的進展情形；中國公教會動態，與其所遭遇的各種課題等。總而言之，它得繼續着告訴給傳教士們在讀書時代已開始研究過的各種問題的演變。這個刊物，並應作為他們彼此交換意見的論壇，互述經驗，討論傳

教問題，尤其文化方面的。

就目前說，這些討論文字，散見於若干種刊物裏，例如：「教務叢刊」，（註二十八）「天主教神職雜誌」，CATECHETICUM，「北京公教月刊」，PELLARMINO（註二十九）「超性教育」等。但是若能把凡屬於此類性質的文章，完全交給一個指定刊物，譬如「教務叢刊」之類的，去發表，不是更覺合宜嗎？那末，這刊物就真成了全體傳教士的刊物。它可以專門登載國內傳教問題，或其他有關問題的文字，把其他神學、神修、學術等類的文字，讓給其他雜誌去發表。這樣，任何傳教士連僻處鄉間的在內，都能明瞭最近一般問題，時時墨念着中國歸化的整個課題；各人在自己教區裏，把個別的工作，去適應全體。

（註二十八）該刊編輯白德風神父 R. P. Bodelfeld 曾再三要請全國教士幫忙投稿，以便該刊變成真正的傳教士自辦自看的雜誌。

（註二十九）此乃上海耶穌會神學院出版的對外不公開的刊物。內容除有關神學的刊物以外，偶有關於現代中國傳教問題的文字，非常有興趣。

第十一章 文化傳教工作之組織

第一節 大家合作

文化傳教工作既有如許迫切需要；那末，現在的情形竟如何呢？我們倘若回想二十年前，自宗座代表來華，形成中國傳教史一大轉捩的時期起，當然得承認目前的清形，已迥異當時爲有利。

先說咱們現有大學三座，真正辦得日有起色，聲譽鵲起。這都是些學術工作的策源地，在中國國內已根深蒂固，並已打進全國教育界，學術界共同活動的範圍。此外，再加上香港的人學生寄宿舍，上海徐家匯天文台，北平測地質生物學研究所，天津的北疆博物院，上海的震旦博物院等。中等學校也大有增加；好幾個文化事業機關，如公教教務聯合會，龍光通訊社，上海「漢學編譯所」，主徒會，香港「公教真理學會」，「光華學會」，中國司鐸學術研究會等，都已次第成立。

我們的新聞事業，也相當發達。雖然目前因環境關係，華北唯一的公教日報暫時播遷內地；但是剩下的還有不少其他期刊。好幾個修會——內中如主徒會，保祿會等——都已把新聞專

業，列爲本會事工之一（註三十）。最後，爲養成文化工作的得力人材，還設立了各區聯立大學院，司鐸書院，北平與其他各地的語文學校等；類此種種，日後都能成爲學術工作策源地。所以說，大致情形，較之二十餘年前，已經進步不少。

然而工作範圍是廣大無限的。由本文涉筆所及，就可給人以相當概念，雖然還有許多缺點，根本提也沒有提到，縱令全國中外司鐸，完全不做的。那一齊下手來幹這文化傳教工作，怕還是事浮於人，力有難勝。何況照現在情形，大部份工作人員都被各個別事工所吸收，而整個文化傳教工作，中央專業機構等，反處於萎縮狀態之下呢？

可是，假使能認清中國公教會的使命，主要的還是在使全國公教化，是引導中國的進展歸向公教，那末，文化工作，就應該爲我們各種急務中的第一位，而將最得力的人員，用在這上面。在一切應舉辦，應擴展的事業中，得分個先後次第；而全般傳教工作的組織，更應以此種次第爲標準。所以此次戰後必須大量增加文化工作的人員（註三十一）

在實行全盤文化工作計劃時，主要的責任，自然地著落於管轄大都市的教區。大都市是天然的學術中心。本來一湧大思潮，都是從這些都市產生出來，擴大起來。一切文化機關，也都集中在那裏。它們吸引著全國的思想家，著作家，文化人。還有各大報，各重要刊物，各大出版公司，幾乎完全集中於此。我們對於大都市在散佈思想上的重要性，是不憚詞費的。中國的較大都市也不過半打以上。所以事實上，也只有那七八個該管教區肩担著大部份的文化傳教工

作；榮譽也歸它們。負擔也歸它們，責任也歸它們。

很顯然地，只靠它們自己的能力。決勝勝任。這些文化事業，不拘是日報，刊物，中大學教育，或其他文化學術機關，都需要很多，不同，須加慎選的專門人材，都需要大批的經費，尤其在比照需要隨時擴充增加的時候，這些事業的影響，遠超出一個單位教區的界限與需要之外。它們具有全國性，與各教區乃至全國的前途，均有關連。

所以各教區，各修會都應當出人或出錢加入此類事業的組織。（註三十二）

（註三十）各公教出版機關亦有若干發覺，應予指出。

（註三十一）過去到現在，可以很近情理地說：「有一句話，在中國說，比任何他處都貼切，就是天主教所謂傳教，等於「勸化工作」，誓反教所謂傳教，等於「文化活動」。（見羅文達氏前書頁五六，引 R.P.Arens S.T.—Das Katholische

Zeitung's—Wesen 頁二四中語）

（註三十二）關於戰後各教區應通力合作一事，可參見前引桑神父 R. L. Lehmann 一文內

所建議。本文會略引教事（教務叢刊，一九四四年，頁五三以後）

第二節 文化工作協會

文化傳教是中央專門機關的本格事業，已如上述。這些機關，勢須變着方法去擴充它們的活動領域，加深它們的影響。

但也不是說定要它們來包辦一切。其實，一般傳教士，不分中外，乃至一般公教徒中的有識者，都應該各就自己的範圍，各就自己的專長，各就自己的能力，分工合作。總得讓他們每人關心着一種工作，如新聞事業，出版事業，譯述工作，流通書報，聯絡感情與教育事業等。

有一樁大事，極為迫切，而為大家所應贊助的，就是要做一個「現代中國文化動態總調查」。應調查的事項，如各種文化運動，國內思想界各部門，如宗教方面，哲學方面，德育方面，社會方面，教育方面等的現狀，以及由以上種種而產生的傳教問題。至於調查資料，有如現代中國最受人聽從的作家的作品，主要的日報雜誌，討論文化問題的專門著作等。過去，戴淦良神父 R. P. Wieser 曾編輯「現代中國文摘」La Chine moderne 以一人之力而完成「連環」十種。現在可以繼續這項工作，使之歷久常新。伴隨着中國的轉變，此種調查資料，也日益增多，非有多數人協力合作不可。

最好由中外司鐸與教內通人，分別注意一種日報或一種刊物，隨時加以檢討。設法讓任何

一種重要刊物都有一人或數人去勾稽，審查。其他現代主要著作家，如梁啟超，孫中山，魯迅，蔡元培，林語堂，胡適，馮友蘭，巴金等人的言論，也如法整理。這些思想家，每一個都得到適當方法去研究他。還有，一切專門問題，也可由各專家或愛好家，在現代出版品中追蹤研究。

有的人可以研究佛教宣傳，有的人研究教育問題，有的研究哲學問題，其餘以此類推，研究的人數越多，越容易確定各項研究之特殊而具體的目標。例如天主的觀念，來生，婚姻，離婚，教育，自由等。

各人的研究，不僅是爲個人自己用，而是爲組成一個總報告的一部，然後將這總報告公之於衆。各問題担任者，可以把自己的材料，隨時整理後，發表有系統的論文。（註三十三）

這樣，中國公教界便能完全明瞭國內各種文化問題的真相，由認識自會生出反感和關於辯論方面文化工作方面之各種新的嘗試。那末，文化傳教事業上，第一個頂大的頂處類的障礙，亦即對各種問題的隔膜，便可以克服下去。「渾噩者無欲」(No, thank you)。此之謂也。

此種集錦研究，日後或者竟可轉變爲另一種新的創舉，例如編纂一部供教外人用的「中華公教百科全書」，內容要充實而新穎。這樣一部書，定有大用處。（註三十四）

我們的言論機關的工作，也可藉此順利進行，因爲每一種專題研究者可以隨意查閱及指出某篇論文應加檢討，某種論爭應加注視，某種答辯應有準備。必要時，他們自己也可以

執筆屬稿。

想把這項協力工作做好，必須聯合所有中外司鐸、教內學者，組成一個「文化工作協會」。該協會的宗旨，應是集中大眾的力量，聯絡衆人的工作，發動各種創舉，徵求各種建議，早日諸實行。

它還要和其他機關合作，發展公教新聞事業，計劃創辦新報紙，新刊物，以饜教外讀者。替公教界社幫各樣的忙，替它們羅致人材，介紹文稿，供給消息，勸募訂戶。設法在教外刊物中，發表公教性的論文與報告。

關於如何增產辯道性的書籍、刊物、文章，給教外人看，如何使之大量推銷，也由該會去設計。對於公教作家，該會應作種種服務，例如報告已在進行中的各種編譯工作，免其雷同；譯質粗糙感學者後，變成「翻譯現代名著表」；新進譯述家的文理程度。委人鑑定等。

該協會應負責調查文化傳教事業之合格人材，製成分門別類的調查表，註明各人專長，和如何進行某種工作，以備隨時諮詢，隨時邀請合作。

這協會亦應負責搜集上述中國思想動態之各種檢討。

又應研究如何去主辦，發起，各大都市的公開講演；如何利用廣播，話劇，影片，去散佈公教思想。

這協會的另一任務，就是提倡公教徒參加文化運動；推動中外公教文化學術機關與中國教

外機關的接觸與聯絡，引其協力作共同的學術研究。

這協會應設法介紹中國留學生，到國外公教學校去深造，並與國外各地公教所設留學生指導機關合作；沒有這類機關的地方，促其成立。

還有一種重要工作，就是研究鼓動的宣傳方法，使公教思想深入全國人心。爲此，這協會中樞部，應與一切從事傳教工作的人員，保持密切聯絡，徵求各種建議，來編製若干種適合民衆心理的宣傳工具，如課本，小冊，傳單，圖畫，表格，招紙等，並研究中外公教與非公教團體所用向大眾散佈思想的種種不同方法，用它來廣揚公教教義。

該協會還要徵求關於文化傳教工作的種種建議。很多人對發展事業，想出了很好的主意，却苦於無可告訴，不知道誰能注意它，利用它。

總而言之，該協會的宗旨，就是用盡各種方法去與教外人，尤其智識份子接近，散佈公教思想。

該協會的會員，就是全體有意參加此項傳教工作的本籍外籍司鐸，和在俗的智識份子。不拘任何形式的工作，不論業已從事此種工作，或志願參加的，都行。

該會得有一個中心機構，包括一個或幾個辦事處；辦事人員的職責，就是推動會務。他們本身不一定非發表著作，譯述西書不可，但須是該協會的最活動份子，能替各地會員多方服務，搜集材料，成立聯絡，徵求人材，辦理各種交涉等。

辦事處，對於全體會員聽其自由獨立工作。又當與性質相近的機關如教務聯合會，漢學編譯所，公教真理學會等保持緊密聯繫。每遇機會卽和此等機關通力合作，但須注意勿侵犯它們的工作範圍。中國之大，事工之繁，足有供很多平行機關努力的餘地。

這辦事處的人員，不必多。但須個個都是能幹的，敢幹的，深信此種事業之重要性而願意完全獻身於此的。這些人都得對於協會的使命，非常明瞭，知道自己所願做的是什麼，並且盡力去做。一個團體的價值，全在組成它的會員本身，尤其在領導它的會員本身。

所以我認爲適應來日文化傳教事業的需要，爲統一力量，加以組織，非創立這樣的一個協會不可。

該協會進行工作時，須受公教統屬當局的最高指導，由該管者指授方略，襄助其活動。

(註三十三) 參看本刊本卷第一，二期，「關於現代中國思想動態的檢討」一文。

(註三十四) 按現在編印中的，已有一部西文的公教百科全書。是剛大主教發起，囑輔仁大學負責編印的。西文原底已交Harcourt書局起草，此次歐戰中，並未停頓，預計一九四四年可以脫稿。

此書編印計劃裏，最令人滿意的，便是它專替教外人着想，要讓他們明瞭公

教會對現代各種問題的態度。不但要竭力作成一部真正有學術價值的東西，而且其貼切着中國特殊情形，將公教道理與中國哲學接近之點，特予指出。

據說全書共計七冊，每冊一千二百欄，每欄一千字。並且每條都附舉若干的英法德文參考書目。

希望這部書能够完全適應目前中國的需要。其中文本要用淺顯正確的文字譯述出來，而由一家對中國教外學多有強大的宣傳力的出版家發行。

第三節 主教會議

不消說各區代牧監牧，在文化傳教事業上，當然有一種超等的使命。這因為事實上這僱事業的效益，是有全國性的，而其影響，也是普及於全國的。所以負其責者，也是聖父以中國歸化大業相付託的全體牧守；他們須要恪遵着羅馬的指示，去厥發，領導。

況且僱這項事業而使用的方法，大多數須在各代牧區或監牧區，分別施行，這當然必須假定預先得各教區首領的同意與合作。舉幾幾簡單的例。譬如出版事業之發展，教育事業的擴充，神職班的栽培等，這些事工，既大部份屬於主教管理範圍，自然應由他們彼此商討，共策進行。目前大家公認全國各教區間，必須互相聯絡，而主教們便正是這種聯絡之代表人。

根據以上原因，足見主教團定期會議的必要。況且歐美很多國家都已有了此種成例。在別處

收效甚宏的舉措，此固當然也。不會不產生良好結果；尤其在傳教國家裏，問題更爲複雜而微妙。因而，要解決這些難題，也需要主教們不時的彼此磋商。

這類會議，可以集全國主教，不論南北，或是全籍出席，或是每個大傳教區內公推一二位代表。或者也可僅僅舉行區際會議，譬如華北一個，華中一個，華南一個。

欲求結果圓滿，每一次會議，必得有極細密的準備。起草議事日程時，各位主教所準備的提案，可於數月前開始徵集，或者也可以成立各種提案整理會，預先研討各種問題。總之，出席諸人，必須明瞭會中待決事項，以便事先分頭研究。這樣全體會議時，可以節省時間，討論時，也各有成竹在胸。臨時的動議決議應設法避免。

爲規定議事程序並保證實行議決事項，可以組織一個常川或半常川的秘書處，作爲會議的執行機關。實際，視隨時需要，這類小組委員會，很可能逐漸增加。美國的全國天主教公益大會，就是一例。（註三十五）但是這裏不一定要抄襲別處；各種共同行動的創議事項，仍應以國內具體而顯著的需要爲出發點。要想做點見效而持久的事，這是不二法門。

這話雖係特指區際會議而言，而同一理由，對全國亦可存在，尤其關於極普遍性質的問題。自然不消說，這類會議完全受羅馬教廷的監督，教廷認爲必要時，可以派遣代表來監督會議機宜。

(廿二十五)「美國全國公教公益大會」National Catholic Welfare Conference 包括

下列各組：執行組，教育組，法令組，報業組，公進會，在俗組織部，社會事業部，青年組等。另有公教，統計，修院，善會，會務，電影，廣播等小組委員會。同時，舉行主教定期會議一事，也是「夫至大」通牒與上海（公會議五七九條以後）所主張的。聖父宣稱：「往往有許多件事，每與一方公共情形有關係，設非公共解決，其不能也固顯然明白。然則大有裨於教會者，即傳教區所有主任，能一一於約定時期，同聚一堂，使彼此得交換意見」云云（見 A. A. S. 一九一九年，頁四四四）

結 論

現在該收束這篇研究，並下一結論了。

正如我在開始時所說的，我的目的，並不是想把文化傳教問題，作一整個檢討。有些極重要之點，根本連提都沒提到。譬如，廣播，電影，話劇等，這三種宣傳方法，對於整個國民心理，可有極大的影響力。每一種都需要一個專題研究。關於利用職業團體或青年集團，如歐洲各小國聯合會，或童子軍。或青年會等組織，去做散佈思想工作，也同此例。還有很多別的問題，如公教藝術對文化傳教的供獻，以及公教圖書館組織等，也都只好讓別人去討論。同時，即就我所論到的各種問題而言，也得逐一重提，澈底討論一下，我只是站在文化傳教的觀點上，稍一涉及而已。

我也絕對不想自以為是，強人就我；妄想自己提出的建議，一定是對的，是惟一無二的。假使，我因信筆所至，給人以「一言定讞，論或不刊」的印象，還請讀者曲加諒宥，鑒其初心。我的意思，原想就普通觀點把這問題討論一下，讓大家注意到它，提出若干意見以備日後彼此商榷，如是而已。假使在提出的解決方案中，有些同道覺得太不完密，近乎空想，不成熟；那就請他們直陳已見，提出更好的方案。要緊的是知道注意這些重要問題，通力合作，去覓取最

好的方式，收到更大的效益。『說完了。有些人也許問我：『這些個計劃有什麼用？反正永不會實現。淨是紙上談兵，徒見其終成「佛教八股」而已。還是得適且過吧！』

這話裏面也不無至理。當然，淨說計劃不夠。甚至認為一經定出計劃，一個問題便告解決，這也是應變防的錯處。可是，要對一樁大專業做有益而有效的工作，總得事先仔細考慮一下，要達到的是何種目的，應使用的是用何種最好方法。

無論什麼大遠征隊，不分軍事的，科學的，教務的，非先有妥善設計，良好籌備，適當方法，決不能成功。當然，任何計劃，得合乎實際需要；得竭力使它接近現實生活，以便隨環境的轉移，加以更正，調整。但若以任何計劃決不能照樣實現為藉口，便不肯觀察課題的全貌，設定一個行動方針；那無異於隨波逐流，盲目前進，結果非誤入迷途不可。所以我們總得對中國歸化問題，有一個整個觀念。得明瞭傳教事業的具體需要，得準備去釀成必要的機構，去使用最適當的方法。

有些人，或許對我這篇文字，感覺驚奇，不滿。問我說：『你憑了什麼任命，來做計劃，給別人發號施令呢？』自然，不消說，這不過是些簡單建議，決不是什麼號令。中國歸化問題，不該只讓教會高級當局去操心。凡關乎天國開拓，聖教廣揚的一切，都與我們大家有密切關係，因為我們都是這家子的人。這話就任何肩友說都對，而就我們做司鐸的說尤其對。聖金口若望說過：『司鐸是一個宇宙全人，關心着全人類的磨難與痛苦，好像全世界都付託給他而被立

作「儕的慈父一樣」。

全中國公教化這理想，不是一直在牽引着我們嗎？它不是我們中間多數人的聖召勸機嗎？它真能成了一種「影病」，身不由己的追着我們。這就是我寫這篇文章的動機，我是把一年來沉思的結果，傳達給一般同道們。（註三十六）

同時，一個傳教士，要想聰明地幹他的個別事業，總得先把全盤問題考慮一過，再拿自己的工作去加以適應。

有些同道對我說：「你的目標太高。想把你所建議的事，都在停戰後立即實現，決不可能的。」那是當然的很。任何大企業的計劃或綱領，其實現無不是漸進的，無不受其可支配之經濟的限制。但縱使某某若干點一時無法實現，至少也得認清這是一個缺陷，設法去彌救它。

有一件事，我想特別指出的，就是我所以然在這篇文章裏認爲公教徒，以團體論，對於本世紀來中國文化的進展所生的影響，微乎其微，並不是有意貶低過去從事文化工作諸人的功勞。實際，洽與此相反。雖說特做的事工和可用的方法之間相差懸殊，雖說他們人數有限得很，他們竟竭力盡智地忠於所事。這更足証他們勞苦功高，更值得令人讚揚。同時，過去已實現的長足進步，和現在還能讓我們在戰後擴大行動的情勢，不都是出自他們之賜與嗎？

此外，我所以在這篇東西裏，對於言論事業，教育事業，尤其高級教育事業的工作方式上，略有幾點建議，也並不是想暗示着這方面成績毫無。反之，我的想出那些意見和一再申述，完

全是根據了過去已成的建樹。

同時，這篇文章的目的，也不是想做一篇過去一切的沿革史，而是想提出若干個人認為最能適合現實需要的方案。可是假如因為我記性欠佳，偶爾遺漏了些什麼，我情願對關係人道歉。

無論別人對本文中所述種種個別建議，作何感想，我認為終有事實顯然，無可置辯的，那就是這些建議所根據的原則。

第一個原則，就是中國全國的歸化，是超越一切個別事業的主要事業，甚至連個人皈正也不如它重要。誠如傳教神學家 R. P. Charles 所說的，我們的目的，首先得是「使文化本身公教化」，是「把福音的麵肥滲入中國整個社會機構裏去」（傳教進行會叢刊，頁三八二）我們應當讓福音的原則，滲入中國的精神裏，文化裏，制度裏。

既然整個社會集團的公教化，才是中國公教會的真正最大使命，那末，我們就該以此為主要關懷，主要努力的標的。我們不但是「在中國的傳教士，我們尤其應是「整個中國」的傳教士。「中華全國」，才真是我們傳教領域。我們不僅是，或首先是，某區的傳教士，某修院，某學校的教師，或院長，校長。在我們的個別事業之上，還有一般事業，全體事業，那是超越各地方事業的。在致力本位工作之際，我們別忘了全國的歸化工作。

還有一個不可動搖的原則。當然，凡是勸化皈正的工作，都是一種超性的工作；就這方面

說，它是天主聖寵的功效。但就人事方面說，中國的歸化運動，主要地還是一個文化工作的問題，一個思想宣傳的問題（而思想又是行動之母，叛化的動機）。因此，我們的第一要務。應該是讓公教思想滲入全國精神裏。在一切應用方法裏，我們應該儘先選用那些最能夠把公教原則傳入智識界，傳入民衆心理的方法。

我們的努力宣傳，首先應以何人爲對象呢？是那三百萬已領過洗的教友呢？還是那四萬萬教外人呢？當然還是那些外教人，尙未明瞭基督與自己之關係的，要我們去勸化歸順。教友們的熱心與否，堂口的團結與組織，固然值得我們去致力，有了他們，我們才算使公教會在中國扎根；然而，在中國殖立公教會的目的，仍是爲把中華全國領向基督，所以在我們的宣傳裏，在我們的出版品裏，我們要時時懷念看那要我們說服的四萬萬教外人，尤其是領導國族命運的那些智識份子。所以說，我們的日報，雜誌，與書籍，都要爲他們而編而寫。

要對智識份子和一般教外人，發生真正深刻的影響，我們非得接近他們不可。我們要設法明瞭他們的心思與願望。我們要研討各種文化動態，好能體驗現時思想的進展。我們要參與各種思想論爭，各種雄辯，參與全國的進展，以便能夠把它領到基督那裏去。

以上若干原則，都是我認爲不可否認的，在戰後應來光照我們的傳教工作的。我們別爲若干地方性的，局部的，近效的成果，犧牲了應用最善努力的全盤大事業。

天主偏在這時代，叫我們來致力中國歸化工作，是他賞給我們的大恩。這也許是他上智預

定的時機，要進行東方文化與公教的接近。中國已經擺動了，在轉變着，進展着了；它正在尋求着新的方案，新的人生哲學。（註三十七）過去，他已嚐够了死亡的理論。最優秀的思想家，似乎已想放棄過激學說，想從西方文化裏，採取最好的成份，公教的成份，來充實中國文化。

試聽中國法學名家吳經熊博士的議論：「關於東西文化問題，我覺得它們原是彼此深入的。可是，我不抹煞它們的特質。前途的希望，寓於東西兩方的結合；而它們行將結合的時期已經來到了。我們正趕上最好的時候，人類所期待的時候，百萬餘年來預定的時候。頂主要的，是要時期成熟，而東方與西方俱都成熟了。」（註三十八）

吳經熊博士以他的皈依公教一事，向國內同胞，指出什麼是東西交融的關鍵；並說明這與中國人心多有關連的「愛之宗教」，所給與中國文化的，是何種財富。（註三十九）

同時，戰爭所引起的普遍動搖，似乎眼前已經把各國民族推近了真教。對中國的進展，也決不會不發生反響。

所以我們似乎應該加緊準備未來的傳教工作，好等戰事終了時，已一切就緒。目前環境，使這樣多的傳教士強制停頓工作，又把他們從那麼多的教區集合在一處，對於此項準備，非常有利。

我們要乘此機會思索一下，彼此商討，釐定計劃，以便將來能盡力合作從事於中國歸化運

動。

附記——筆者爲修訂整理此文起見，希望讀者惠予批評，指教，與建議，不勝感激之至。

一九四五，七，二五，譯竟

(註三十六) 我想最好再聲明一下，我絕不想自命爲本文內各種意見的創獲者，我只是把很多傳教士關於這些問題的意見，加以歸納陳述而已。儼人因在內地傳教十五年，和這些問題久已脫節，特爲此事請教了多少明白人；他們的意見，幫助我把自己的思想調整了不少。

(註三十七) 十教授「建設中國本位新文化宣言」所引起的大論戰，最能代表現代中國思想界特色。見 Bellarmino。一九三八年七月號，張沈二神父所著「在尋求中的中國文化」。

(註三十八) 見教務叢刊一九四一年，頁二七三，引吳君語。

(註三十九) 見愛的科學英文本，吳經熊著，香港公教真理學會出版。

附錄

關於現代中國思想動態的檢討

檢討的必要性

爲了要使智識階級接受公教的原則，我們必須先認清這個階級的心理，以及他們對現代問題的態度，如他們所依據的基本觀念。

如欲使我們的傳教工作發生效果，這第一步的檢討是絕對需要的。一個本身具有堅強理由的論證，由我們看來是很明顯的，但爲與我們的教育不同的讀者，却不一定會發生效力。爲什麼呢？就是爲了他們的心理和出發點，與我們的完全不同。

根據這種觀察，顯見得我們必須由他們的觀點來進行，以便使我們的傳教適合於他們的心理；因之，我們對他們的心理和他們對一切大的問題的態度，也不得不有研究的必要了。

檢討的性質

我要檢討這成千上萬的智識階級的心理，首先我們要研究那訓練這些智識階級的教育，

換言之，就是要研究那些被認為智識界的領袖的人，以及那最能影響讀者的雜誌，和出版物。因此，我們認為絕對必需下一番特別的苦工，對那些著名的作家，最受歡迎的雜誌，以及那支配着現代思想動態的叢書等，作一番特別的研究。

這種苦工該由什麼人來担負呢？顯然的不是一個人的力量所能辦到，非由大多數人的通力合作不為功。合作的人數越多，檢討的成績也越完全，同時那考證與實際的價值也越偉大。因此我們請求一切對這問題感覺興趣的人，來與我們合作。

合作的辦法，最好是每人任意選擇一位作家，一種雜誌，或一部叢書，由他把這位作家的主要作品，或雜誌叢書裏面的重要論文，全部研究一番。

在這部書研究的工作中，每人同時要研究這些著作裏面所包含的中心思想，以及有關公教道理的地方，把它記錄出來。這些個別的研究先可以在雜誌上發表，以後搜羅起來，便成了一部專書。這樣的一本書，很忠實的網羅了現代中國的觀念及其指導者的心理，對於我們傳教士和一切有志文字傳教的人衆，必能給與很大的供獻。一般從事教育的人衆；爲了訓練大學生，修道生，未來的傳教士，都可利用這本書，使自己認識那些將來所能得到的流行學理，錯誤與武斷的思潮。最後，這本書的完成，對於智識階級與公教會的文化攜手，必將有很偉大的供獻。

計 劃

爲了使這些不同的研究，具有一個劃一的聯絡起見，我人以爲最好再將以下的計劃，介紹一番：

每一位作家或每一種雜誌，應用兩方面去研究，因之也包捨了兩篇論文。第一部研究的對象，是作者對於哲學和宗教的重大問題的態度；就是要知道他怎樣看人生的終向和意義；靈魂的問題，靈魂的歸宿與不死不滅；天主的存在，造物主，天主的掌管世界，審判與賞罰；道德標準與良心，道德的制裁；超性問題，一般宗教，基多主義，天主公教等。

第二部研究，是研究作者對社會問題的觀念，如禮教，主權，自由，資產；家庭，婚姻，離婚，自由戀愛，婦女的權利；教育，以及父母國家和公教會的教育權；階級鬭爭，共產主義，國家主義，信仰自由等。

最好還要研究他們對某一項主張的理由，以及這種主張的演進和他們的這種主張，是受了那一方面的影響。

論文的篇幅，每篇最好達鐸辟月刊的二十頁上下，至於在那裏發表，以及發表的日期，全聽作者自便，不過截止期規定在一九四六年底，而在一九四七年初，便開始搜集編輯，俾成專

書。

關於前面所介紹的研究目標，以及研究工作進展的長短，不過是一種提議。又在研究的過程中，作者假如發現其他有關辯教的問題，而欲將討論的文章擴大，也聽作者自便。

觀 點

最緊要的，是我人該有一個同樣的觀點，那就是：我們的研究工作只是一個初步的檢討，目的是要觀察所研究的作者的心理和態度。因此作者不必去駁斥他們，也無需把公教的相對道理介紹出來，那是以後的工作。

現在所要作的，是要深入我們所檢討的作家的精神裏，將我們列在他們的觀點上，以便更真切的領悟他們的立場與觀念。這樣，假如他們讀了我們的檢討，必然自幸是被瞭解了，而對我們解剖他們的觀念的工作，點頭稱善。

只有在這初步檢討之後，我們傳教士纔能有效的駁辯他們的錯誤；把那足以徹悟他們的理證，諍服他們；同時再把公教的道理，就用他們自己的精神語調介紹給他們，以便使他們感受深刻的印象。除非先有了相互的瞭解，偷盲目的只管筆戰不休，對於事實，絕不會發生任何效力的。

精神

最後，便該注意到研究的精神，那是最要緊的一件事，我們的檢討，該富有愛德與尊敬作家的精神，關於爲公教所明白否認的謬理，我們固然該根據真理的權威，不能與以通融；但是，無論那謬理是怎樣嚴重，怎樣有害於人，也該把那寫作的人當作謬理的犧牲者，縱然他確是那謬理的宣傳者，也該對他表示善意尊敬，故此在我們的研究裏面，該絕對避免冷言嘲笑，不屑一談，或攻擊的語言，總不該判斷他們的意向不善。尤其要小心，不該爲了缺少禮貌，使這些智識階級與公教遠離；他們原是國家思想的領袖，總不該和他們對敵，以致傷害了他們接近公教的可能性。我們判斷的對象是他們的學理，固然不怕將他們的學理中的錯誤指點出來，不過，我們的此項工作，是在研究他們的著作而不是要辯駁他們，是要和他們接近，爲的是用我們的大公無私與我們客氣的表情，來獲得他們與他們的信仰者的好感，我們的工作，既然是要在公教與教外的優秀分子間，造成一個文化的携手，因之便該絕對避免彼此攻擊的惡言，必須以和善的詞句來立論，且該絕對承認他們的功績，他們的文學天才，以及在某些地方，他們所表現了的忠誠與善意。

現在，我們已備好一張作家雜誌與叢書的列表，看來可以作未來的研究的對象，並隨

時附帶說明這部工作的進行狀況，凡對於本問題感覺興趣的人，逕可通函鐸聲月刊社，代爲索取。

這張列表，自然難免遺漏，只不過是本問題的一個舉例，讀者倘認爲某作家或某雜誌確有代表現代思潮的價值，很可以按個人的觀點，再選研究的對象。

此外，爲了使此項工作更完善有益，更能達到所理想的目的，讀者若肯賜教一些意見與建議，我們必要忠誠接受，極表歡迎。

聲 明

本文曾發表於北平教區發行之鐸聲月刊第四卷第八九十期合刊上，那時是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月間，也正是勝利後的第三個月中旬。在我們編印這期合刊時，心中高興非常，不只因了祖國的河山光復，也是因了從此以後，我們的刊物能夠達到抗戰時的大後方，並且又能和大後方的神職同志們取得聯繫。誰知，我們的這期合刊還未出版，全國的鐵路交通已比我們先一個月中斷了，只好看着一堆堆印妥的合刊，摆在地上等待發出，左等右等，直等到物價飛漲透過九霄雲外的今天，交通仍無恢復的日期，我們的刊物也只好耐候在冷屋的角落裏。因為物價與交通的關係，強迫着我們不能繼續出刊——這並不是我們的本意——我們非常痛心，有很多很多同志們當面或來函問我們鐸聲怎樣了，我們毫不猶豫地答覆說：鐸聲並未停刊，只是休息的時間比較長一點而已。今爲表示鐸聲確未停刊，我們特將最後的這一期合刊，重印單行本，第一：因爲原印本紙張稍劣，排印也緊湊；第二：因爲本文的價值與時間性，在如今仍甚重大而又適宜，更經我們的樞機主教介紹給吳經熊公使，作爲發展中國教務的指針，其重要很可想見；第三：如同方才所說，表示我們的鐸聲，並未停刊，特此書，作爲中間的聯繫者，並爲給一般關心鐸聲的人們一點安慰。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五月一日出版

文化方面的傳教工作

每冊定價國幣二千元

原著者 高樂康司鐸
R. P. Leonard C. I. C. M.

譯者 景明

編輯 李君武

發行所 鐸聲月刊社

北平四什庫二號北堂
電話：二〇二六六

承印處 光華印刷局

北平和外西甯園十四號
電話：三局〇八九八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CUM APPROBATIONE ECCLESIASTICA

24

002220

ch

002220

(1)